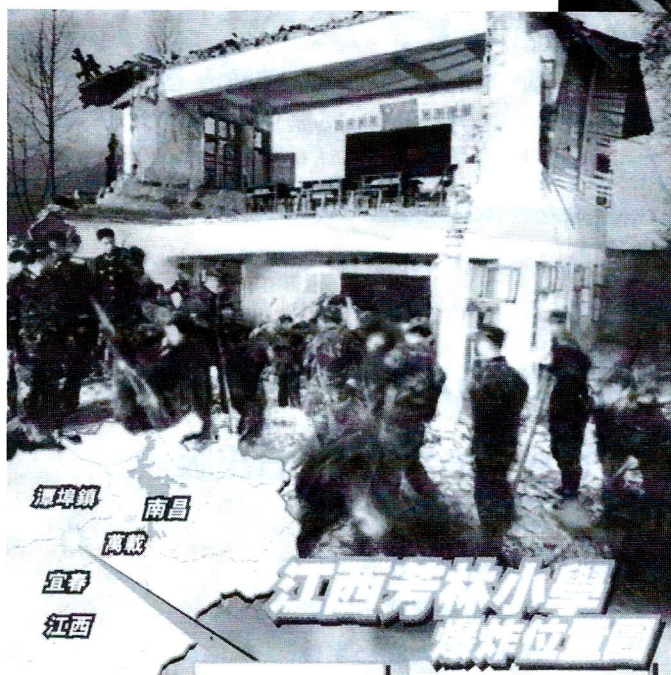


今日中國的 「三農」問題 重慶反特鬥爭



陳方安生辭職啟示 官商勾結 民怨日深

印尼民主被出賣了！ 女性領導運動前進

日本2001年度軍事預算案與防務計劃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官商勾結圖利 民間怨憤日深

振言

為地產商托市謀利

回歸後，特區政府繼承港英政府的「三高政策」，致力於推行高樓價，特首和高官甚至公開替地產商推銷，勸說市民買樓。它初時推出每年「八萬五」的目標，但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樓價大跌，市民買了的物業都變成「負資產」，尤其是那些買樓自住的中下層市民，不少人要被貸款的銀行追加抵押品或減低貸款額，轉售又不值錢，從而陷於莫大困境中。

另一方面，各大地產集團手中的「存貨」價值劇跌，又難銷出去。儘管它們幾十年來已從港人口袋裡搜刮得盤滿鉢滿，許多人都由此變成了大暴發戶，其中有些人的財富位於全球大富豪的前列；但他們毫不滿足，而繼續向港府施壓，迫使後者採取有效措施，

重振樓市，托高樓價。他們批評當局有過多居屋發售；對於當局最近推行的海景優質高價樓，更赤裸裸地公開指責，反對這樣與他們爭客，影響他們的生意，彷彿市民只能買低劣下等的房屋居住似的。超級大富豪李嘉誠更公然要當局減建甚至停建居屋。

在地產集團的重大壓力下，政府再次實行官商勾結，狼狽為奸，運用多種托市手法，企圖推使樓價回升，為地產商謀取利益。於是，下述的一連串重要措施便陸續宣佈實行：

1、收緊申請購居屋資格，家庭入息上限由31,000元減至25,000元，以迫使原可購買居屋的3萬個中下層家庭要買私人房屋；而房委會下年度的居屋銷售量和建屋量都將削減；

2、收緊申請公屋條件，4人家庭入息上限由17,700元減為15,900元，6人家庭由20,700元減為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第28卷 第1期 (總第204期)

2001年3月31日出版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18,600元，資產審查也大為收緊，這使得現時合資格申請公屋的其中1萬多戶的資格被摒除；同時，房委會不斷將公屋地盤變成居屋出售，使得公屋供應量減少；

3、政府公佈下年度賣地計劃，減少供地約一半，以減少私人用地面積，幫助托市；

4、宣佈放寬在實行著的制止炒樓措施，大體上容許恢復幾年前的炒樓活動，任由極少數人炒買炒賣，製造樓市興旺假象，以誘騙市民跟風買樓。

政府這些政策措施，只能對地產商（或者暫時也會對「負資產」業主）有利，而對低下階層市民不利，是政府維護地產財團利益的又一種表現。

刻薄低下階層

雖然政府宣佈香港經濟去年已有可觀的10%增長，但絕大多數港人並未能分享到實際的好處，而不久將來樓價上漲，跟著租金也增加，對他們更是負擔的加重。在當局新的入息限額內的家庭，連維持一家幾口的生活也已感困難，那裡還有多餘財力去買樓、供樓；超過限額的人，也缺少財力去買昂貴的私屋。絕大多數人缺少購買私屋的能力，則是地產物業難以興旺暢銷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政府要盡力托起它，也將難如所願。

居住問題是港人最重要的民生問題之一。他們無力購買私屋，不能租住貴租的私屋，就不能安居，不能有現代人類所應享有的合理居所，勢必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和健康，也會使越來越多的人貧困化，要靠公援過活，要輪長龍申請入住公屋，等等。

面對著弱勢市民的住屋要求，房屋署和房委會的政策措施卻不加以配合，而時常遭到市民（包括「擠迫戶」）的指責。例如，住在荔景村的李太訴說，她家6個人擠迫在180平方呎的單位，18年來一直申請調遷都沒有結果；住彩霞村的林太埋怨，13個人住在不足300呎的單位，卻未得到安排入住較大單位和分戶（2001年1月20日《蘋果日報》報道）。而擠迫戶申請調遷，又須先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審查標準則按富戶標準，倘變成「富戶」則要捱貴租，不再享有廉租的待遇。即使不被變成「富戶」，但一般的新公屋租金，已經大幅度提高。社區組織協會引用房委會文件所顯示，新公屋入伙的住戶，6成家庭的租金佔入息比例15%以上，4成住戶的租金佔入息20%以上（其中3成多更佔25%以上）。這都遠遠超過法例上限的10%，顯示官方的房委會公然違法。公屋住戶與

全港家庭的收入差幅，由5年前的16%飆升至2000年第3季的30%，公屋住戶收入下跌，卻要交不斷調高的租金（01年1月1日《成報》）。同一日的《蘋果日報》報道：社區組織協會在牛頭角下村訪問了182名公屋赤貧戶，發現他們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只有5700元，比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低兩倍；但不久將被清拆而遷入新公屋，租金動輒佔他們入息中位數近一半，加上房署規定遷新公屋3年內不能申領租金援助，他們的極度困難處境可想而知，這意味房署是從「乞兒砵中搶食」！雖然政府現時已累積了4千多億港元的財政盈餘、1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後者排世界第3位），卻不肯撥出部份財政盈餘救助貧苦市民，反而盡量壓榨他們。

再以特首口口聲聲要尊敬、優待的長者來說，他們中的許多人因舊居重建而獲房署新安置的二老住所，卻一共只有16平方米，除小廚廁外，廳房面積每人只有3.6平方米，比香港監獄的囚倉每名犯人4.6平方米的標準還要少！

民怨沸騰 抗爭激烈

由以上的事例可見，當局對弱勢社群的苛待，與它之盡力幫助地產富商獲利，恰成了完全不同的兩個極端。

回歸後成立的特區政府，是黨官與富人聯合治港，其施政是主要為富人利益著想、服務的一一這種現實，我們在它成立伊始就已指出過。它的劫貧濟富政策，加劇了香港社會的分化，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者的差距日益擴大。

政府這種倒行逆施，已積聚起越來越多和越大的民怨民憤，引發出許多的群眾抗爭。近來有兩宗市民行動足以顯示民間的怨憤已達到以公開而激烈的行動來宣洩的地步：一是較早時兩次用屎尿潑在立法會門外，以抗議其住屋被拆卸得不到當局合理補償；另一位經營政府食堂的東主在立法會大門點火自焚（他由於極度不滿當局在本已沉重的稅費負擔之外，高官還暗示要再加費）。像這樣的決心犧牲自己性命來抗議當局苛政的行動，在香港歷史上甚為罕見。

但在嗣後宣佈的來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上述的政府方針政策並不見有何改變，沒有為立法會大門自焚事件所警醒、反思，從而改正自己的錯誤。

2001年3月8日

陳方安生辭職的啟示

微波

陳方安生提出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給港人帶來了如下的啟示：

第一、它表露出特區政府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與不和：她承續著傳統的價值觀，包括只接受法治、不接受超越法律的政治干預，要維護香港原有制度的自由、人權，等等。她由此與特首在許多施政處事上產生了歧見。例如，對特首私人助理路祥安之干預大學民調及他應被辭退，對公安法的爭論、都已是徐四民所認定了的不和事件；至於對居港權、法輪功在港合法地位及其租用大會堂等，也是報章所指出的歧見問題。由這許多歧見產生了她與特首之間的不協調及不和。她透露，在去年7月間已萌退意，當時正是路祥安風波而特首曲意維護他的時候。

第二、它顯示出親京極「左」人物的政治干預，從中「挑撥離間」（陳太公開這樣指責他們），視她為「港英餘孽」，暗示她是「倒董」的幕後黑手、陰謀的主腦，要除去這顆眼中釘才肯罷休。他們不斷推波助瀾，火上添油，加劇了京、港高層對陳太的不滿。

第三、它證明了京官的出面干預，是去年9月突然召她到京的原因及其結果。會見後當日新華社公開報道錢其琛要她「更好地支持行政長官的工作」，亦即是指她沒有這樣做到，證明中央對她很不信任；京官所需要的，是完全聽話、絕對支持中央和特首的官員。她在會晤廖暉後見記者時已不再現其慣有的笑容，反映出她的心情沉重；嗣後一段時間常到外國，也反映她的意興闌珊。這次召見表明是最後逼使她辭職的決定性一擊。

第四、這又一次表明了：中央及其特區行政長官所實行的是一言堂，不能容忍屬下有其他的不咬弦、不順從的聲音。陳太在香港各次民調中的聲望得分，都高於、甚至遠高於特首，更是使最高層難堪、不安的事。

陳太在以前曾說過，她不會做違背良心的事。她的言行贏得了西方傳媒的「香港的良心」美譽。

而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卻批評，陳太在政府內扮演反對派角色，「似一個民主黨成員多過公務員首長。」（1月19日《蘋果日報》）批評者以此表現自己對中央的忠心奉承！

但在陳方安生提出辭職後，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對770人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近3成人選她為最喜歡的香港政治人物，曾蔭權得7.1%，董建華則只得3.8%（1月24日《蘋果日報》報道）。這反映港人對她的觀感，與那些親京的「人大代表」等人很大不同。

繼任她的曾蔭權，今後將較為可能達到北京的指望，好好地支持特首的施政，不再像3年來陳太那樣敢於向特首說「不」。他將以圓滑的手腕、花巧的言詞、有名的「狼來了」作風，去擔任政務司司長這個職位。

接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寧願辭去摩根大通銀行亞太區主席這個優薪高職，每年少收入約2千萬港元，這顯出他不尋常的決心從政的「壯志」。他就讀香港大學時曾是親京「國粹派」的一員，聽說到過井崗山等地參觀。他的「紅」底子會是他為北京中央、香港「左派」、特首幾方面所喜歡而被選上的原因，也是他將來可能繼任香港行政長官的重要因素。他在73年畢業後即投身美資銀行工作至今，與商界關係密切。他以這種背景與董建華合成三頭馬車中的兩馬，更加重了商人治港、更照顧工商富人權益的氣味，而政治上政策上則會更加從「兩制」向「一國」傾斜，使香港漸趨內地化，收緊港人的自由、人權尺度：這是陳方安生辭職啟示出的港人巨大隱憂，而亟需港人今後努力去爭取民主自由權益、阻止上述的趨勢發展的！

2001年3月5日

「三農」問題在今天的中國

張開

棄耕、減產、糧價跌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顯出其嚴重性、以至危機性。雖然中國財政部長在今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2000年的國家稅收高速增長，幾乎相當於經濟增長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將近翻了一倍；但這毫不意味「三農」的增收也同比例地增長，相反的，國庫的收入是與「三農」的減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向農村、農民加大徵收稅費的力度所得的。雖然總理朱鎔基同時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宣稱農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了2.1%，5年間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但這與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及價格都大減的實況很不相符，也與學者專家的調研結果及其他報道的實況大為不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的數字，2000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了9%。減產的直接原因看來是糧食種植面積縮減；農業部門匯總計算，2000年的種植面積約為16.07億畝，比99年減少了9千萬畝，減幅為5.3%，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播種面積最少的一年，低於1.1億公頃（即16.5億畝）的警戒線（據統計局調查結果推算，2001年又將比今年進一步縮減1.7%，約4千萬畝，即減至1.07億公頃）。

種糧面積如此大幅度減少，是由於農民負擔稅費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願種田，把農田拋荒。這種情況，在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去年給國務院領導人的信（編者按：該信見本刊今期摘錄）中已有較詳細揭露，這些揭露，已經上級的覆查證明屬實，並承認他所說有「一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在調研後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棄耕：中國農業轉型期陣痛》，對上述問題也作了報道：洞庭湖一帶向為主要的產糧區，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譽。但近幾年來，良田沃土大量被拋棄，其中的南縣，《土地延包經營證書》的發放率

至去年九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農民「不想要田」。有的村，棄耕的土地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是「洞庭湖區大規模棄耕的一個縮影。」「湖區許多農民毫不諱言：棄耕不種，直接原因就是不願或難以承受過重的農民負擔。」

這些是中國「三農」危機的部份反映。

學者的調研結果

「三農」的困難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專家的關注、調研，發表了很多富有價值和見解的文章，論著。以下所引用的學者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 一國兩策」的困境》一文，便是其中一個顯例。

該文指出：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在逐年下降，農村市場在逐年萎縮。雖然1996年以來，農業連年豐收，但農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後，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賣難，價格下降，99年夏季以後，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出現了銷售困難，市場萎縮，農民的收入成了問題，年人均純收入中的糧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農民人均從棉花得到的收入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糧棉收入佔了農牧業收入中的絕對多數，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這3年間，糧棉價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農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很多。

從96至99這幾年間，鄉鎮企業也不景氣，約40%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又使得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大量減少。與此同時，城市又大量辭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達8千多萬人，近幾年逐年減少，99年估算只有約6千萬人。以平均每個農民工一年在城裡淨賺2千元計，農村就要減少6百多億元的現金收入。

另一方面，基層組織、鄉村兩級幹部在10多年間迅速膨脹，人數越來越多。現在一個鄉（鎮）政府人員，超過正式編制幾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一個縣政府的機構還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

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報道：一個5萬多農業人口的江西省樂平市接渡鎮，在99年「機構精簡」之前，像其他所有的鄉鎮一樣，在機構設置上「五臟俱全」：黨委、政府、人大、紀檢、政協、武裝部「六大班子」，以及財政、稅務、公安等「七所」，和農技、水利等「八站」，他們吃飯都要吃鎮裡的。）他們還要拿補貼，要比農民生活好，而國家卻沒有提供這些人的財政開支；反而在財稅改革實行分稅制以後，較穩定和較好的稅收都由地（市）級以上收去了，上繳國庫了。於是鄉（鎮）一級便陷於財政困難，而只能從農民那裡用各種名目收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1〉

另一學者溫鐵軍在《以綜合改革解決「三農」問題》的答記者問時指出：

「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一個鄉的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制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一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約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面面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

由此看來，造成「三亂」、「四亂」和農民負擔特別沉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幹部的乘機胡作非為、以權謀私、貪污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個官僚制度對政經特權的維護，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於中央指令要加強農村的黨政控制力量，以鞏固它在農村的統治，才在各鄉鎮設置那麼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為這樣，儘管中央長期以來重重複複宣稱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許多苛捐雜稅，但是，各地方當局幹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向農民搾取，以致官方越喊減負，農民負擔越重，從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農民苦、農村窮、農業危險的結果。

「逼到絕境後的抉擇」——稅費改革

農民的重擔和困苦，直接激發出許多積極的抗爭行動，和消極的棄耕或出走城鎮等等，但後者因城鎮工業不景，原有工人失業者日增等影響，被迫要倒流回農村；他們所一度棄耕的田地有許多又給基層幹部交由農業大戶承包了去，幹部以此對付農民的棄耕，如果成功，將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數農民也將變成無地耕種的無產者，或者成為「大戶」的僱工。不過，他們至今仍保有原來的土地承包權，許多人都拒絕由村大戶承包，這些發展仍要視中共有關新的法例來決定。

農民的抗爭行動，最多的是集體上訪，向上級黨政部門控訴負擔的沉重，即使增產也不增收，甚至賠本倒貼，難以維持生計。例如安徽省懷遠縣淝河鄉便是個典型。農民除了交農業稅、「三提留」、「五統籌」等款外，還有無數五花八門的稅費和集資攤派。因而幾年內全鄉29個行政村中，有23個村村民在上訪。而村民更有幾次集體開拖拉機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數鄉鎮無法收上當年農業稅的大部份，正常運轉出現危機。懷遠縣領導在1998年底提出要進行費改稅的改革試點，「其實是懷遠縣被逼到絕境後的抉擇」。安徽省領導（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為當時懷遠縣的名聲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點結果，據說在2000年全省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13.93億元，農民負擔減輕約25%，98%的農民表示滿意。但是，問題仍沒有解決，減少的近14億元財政缺口將由誰來補？如果解決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就有問題。以農業為主的各縣、鄉財政，缺少二、三產業的財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補助，地方領導層也勢必又要向農民伸手，使得農民在必須繳納的稅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費」）之後，又要交新的費，重新挑起舊的重擔了。

國家推卸教育經費的後果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的方針，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工業、輕農業，重工人、輕農民的。它在財政上盡力向農民、農村壓搾、犧牲農民的實際利益，很少動用資源去扶助「三農」的發展，而是極多地用於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各地農村

黨政幹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權，隨意向農民進行「三亂」的榨取。這種政策和實際，具體表現於對國家公務員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務員由國家財政支付薪酬待遇，農村鄉鎮的幹部雖然同樣是國家的公務員，「七所八站」是上級政府部門下設的機構，理應同樣由政府財政負擔其開支的，但卻要由農民供養他們。又例如，農村教育經費也主要由地方承擔（包括學校的興建維修、教師的補貼和學校辦公費，等等）。鄉鎮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成了鎮裡最大的負擔」。這些重擔又主要是向農民們攤派的。

學校經費不足，便要迫學生及其家長負擔。當學生極度不滿這種亂攤派致使學生及其家長不堪負荷時，就爆發出反抗的行動。例如，今年2月11日廣東潮陽市仙桃鎮，就有約800名小學生遊行到鎮政府，衝擊政府大樓，砸破玻璃，火燒傢具和檔案文件，以抗議收教育附加費^{<3>}。這是小學生反抗行動的其中一例，由於消息給香港記者獲知，才得以傳到海外。

許多農村學校由於經費缺乏，被逼要強令學生做工，以賺取收入來補貼學校經費。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師生死亡，27人受傷，就揭露出農村學校存在著這種悲慘事實。據《文匯報》報道：「有消息稱，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學校爲了勤工儉學，辦了鞭炮工廠。前幾天還進了一百斤硝。學校如設在炸藥庫上。」而該報記者同日發自南昌的電訊稱：「可以肯定的是，引發爆炸的是做煙花的原料。」^{<4>}據《星島日報》的「特稿」報道：「一家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表示，由於有關部門管理不嚴，在農村的學校或家庭內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的情況普遍。農民耕種每年收入才一千多元人民幣，但生產煙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當天，（芳林村小學）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就是在課室內造爆竹的火藥引。學校是硬性規定學生要幫學校造火藥引，違抗者每天罰款兩元。」^{<5>}另據說，這些小學生的年齡是8至12歲左右。

儘管官方後來宣稱是由嫌疑犯「癲人」李垂才引爆的（不過也承認該校在前年也曾要學生造火藥引），但德國新聞社記者訪問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卻說他「絕對沒有精神病」，也「不是壞人」，而是爲該小學工作，負責運送煙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筆者在這裡之所以較多地引述各

報章的有關報道，就是想讓部份未看到有關資料的讀者，具體了解中國農村教育經費缺少而造成的其中一種悲慘結果，爲歷史作見證。

近來還有一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陝北一所民營孤兒學校的連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陸農村的許多學校，既得不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助，又反而蒙受當地部門和幹部的任意打壓、摧殘。這所被稱爲「像孤兒一樣無助的孤兒學校」，位於陝西省靖邊縣。一九九八年，當地農民馬國成在八歲的女兒死於車禍後，從街上領回六名流浪孤兒撫養，隨後更用外出打工積攢的九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貸款，創辦「國成孤兒學校」。該校成立之初，曾轟動一時，國內各大傳媒都作出報道。但是，據《工人日報》披露，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孤兒學校入不敷支，經濟陷困境。馬國成爲增加收入，貸款擴建招待所，卻被城建部門指違法修建勒令清拆；他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和孩子們栽種了五萬株樹，又被鄉政府將承包地賣給他人，其間損失都未作補償。孤兒學校已欠債六十萬元，四名老師半年未發工資，馬家一萬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後，師生們吃的糧食都是賒來的，而因賒債被拖垮的私營糧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無門的馬國成只好帶著孤兒學校近六十名師生沿街乞討，填飽肚皮後，便隨意找個地方給孩子們上課。這些事再次引起大陸傳媒廣泛報道。^{<7>}

今天在農村所推行的稅費改革，並沒有針對鄉村的財政和公共服務等問題，即使中央提供一些補貼，但主要的財政負擔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後者不願或不能承擔，便要減少教育經費，或者要各學校負責籌措，從而加劇對學生「勤工儉學」的要求，流行對無償童工的剝削，降低兒童受教育的時間和質素。當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調整鄉村學校的佈局，減少學校和老師的數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個行政村，原有鄉村小學644所，過去大體上是一村一校，現在被調整爲249所，使得大多數學生必須到其他鄉村上學，可能造成新一輪的兒童失學。^{<8>}

病根在於現存政治制度

面對者「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危機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今年1月11日發表了《關於做好2001年

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儘管在前頭循官方慣例先肯定「農村形勢總的是好的」，但緊接著即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鄉鎮企業效益下降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糧食生產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係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它還說：農業和農村經濟不能穩定發展，國民經濟的好形勢就難以保持。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並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著提出了10項措施，以圖做好「三農」的工作。這些措施幾乎都是過去所提過的，並無特別嶄新的創意。問題仍在於實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來說，中共已經提了幾十年，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與其他的口號式說法一樣，也是「假大空」性的、畫餅充飢、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似乎是近幾年想出的新辦法，但這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嗎？對於這個「改革」的實效如何，我們已在前面談論過。幾十年來的一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清楚地重複地說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頒佈下看來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幹部仍有辦法陽奉陰違，不加以執行、走過場。這是屢驗不爽的經驗。病根子就在於現存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由於官員不受人民監督，中央獨斷的方針政策既多缺點錯誤，各級幹部又擁有政治經濟特權而自把自為。機構日益臃腫，是這個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徵之一。而任何的政經改革措施都會觸犯有關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從而遭到後者們的反對、抵制、破壞。如果不先「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則一切都將會「原地踏步」，以至變本加厲地發展，不能有效地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

即使有些中共黨員、幹部（甚至位高如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企圖略加以改良、開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頑固的官僚勢力的圍攻、打擊，最後連自己的原有職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來說，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即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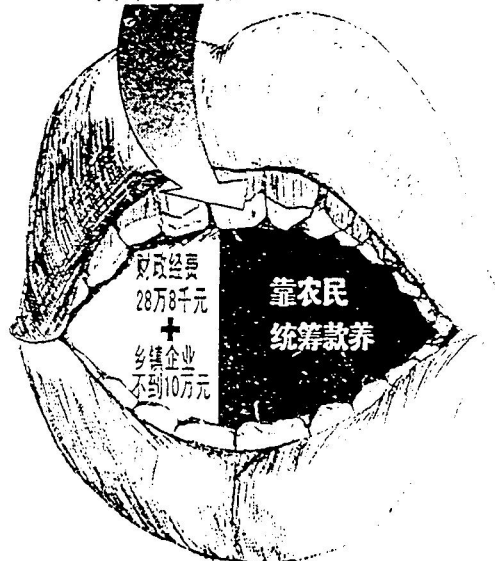
初時據說他的意見已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和很好的反應、採行，但今年1月消息傳來，李昌平因揭露了農村的黑暗，開罪了地方勢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辭職，遠走到深圳打工。儘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報以近3萬張網上和來信選票，當選為年度人物，將他視作中國的希望、良知。〈9〉這件事反映出，他雖敵不過黨官僚勢力，卻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2001年3月20日

註釋：

- <1> 這裡所引述的陸學藝先生文章，發表在《讀書》雜誌2000年5月號上。
- <2> 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的「上訪大縣」的「費改稅」》報道。
- <3> 今年2月14日《蘋果日報》報道。
- <4> 均引自今年3月8日《文匯報》中國新聞版。
- <5> 引自3月8日《星島日報》。
- <6> 見3月10日《蘋果日報》綜合報道。
- <7> 見2月20日《蘋果日報》。
- <8> 有關數字等引自3月21日《蘋果日報》刊出的香港學者陸德泉的《農村稅費改革玩弄數字》一文。
- <9> 詳見1月28日《蘋果日報》報道。

鎮“六套班子”人員工資50萬元
 +
 340名教師獎金和工資的30%共60萬元
 +
 一年7萬元的招待費
 +
 “7所8站”補貼20萬元
 ||
 共計137萬元



接渡鎮吃飯財政示意圖

（摘錄） 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

——寄給國務院領導的信

李昌平

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一、開春以來，我們這兒的農民快跑光了。連續二十多天來，「東風」大卡車（坐不起客車）沒日沒夜的滿載著「外出打工」的農民奔向祖國四面八方的城市。我們鄉有40000人，其中勞力18000人。現在外出25000人，其中勞力15000人。今年人員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點：一是盲流。過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動，今年多數農民是抱著「運氣」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輩子不做農民」的一種負氣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數多、勞力多。過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份富餘勞力，現在是男女老少齊外出。三是棄田撈荒的多。過去出門一般都待田轉包出去後再出門，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數還在升，估計今年全鄉棄田棄水面積將達到35000畝，佔全鄉總面積的65%。現在我們全力以赴做調田轉包工作，估計今年至少要撈荒20000畝以上。

二、我們這兒的田畝負擔有200元/畝，另外還有人頭負擔100-400元/人不等。兩項相加350元/人畝左右。一家五口種地8畝，全年經濟負擔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災，水利等勞動負擔）。農民種地畝產1000斤谷子（0.4元/斤），僅僅只能保本（不算勞動負擔）。80%的農民虧本，農民不論種不種田都必須繳納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喪失勞動力的80歲的老爺爺老奶奶和剛剛出生的嬰兒也一視同仁交幾百元錢的人頭負擔。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

三、1995年，約有85%的村有積累，現在有85%的村有虧空，平均每村虧空不少於40萬元。90%的村有負債，平均負債60萬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約有70%的鄉鎮財政有積累，現在90%的鄉鎮財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於400萬元。平均負債不少於800萬元，月利率高達15%。村級負債每年增加10-15萬元，鄉級負債

每年增加150萬元左右。

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村級集體虧空一年比一年多，鄉鎮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們棋盤鄉不搞任何建設只交上面稅費，發幹部的工資，支負債款利息，收支兩品，鄉村每年淨虧1000萬元。這樣下去，基層組織和政府怎麼運轉？

四、90年棋盤鄉吃稅費的幹部不過120人，現在超過340人，並且這種增長的勢頭無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領導無法頂住內外壓力，不得不濫用權力安排一幫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幹部增長何時休？……農民怎麼受得了！

……

六、中央扶持農業的政策，保護農民積極性的政策，很難落到實處。近年來，沒有對農民發放過貸款，即使有極個別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貸）。沒有按保護價收定購糧，相反，國家收糧還要農民出錢做倉容。國家不收糧，農民自己消化還要罰款，甚至還要沒收。農民負擔年年喊減，實際負擔額極個別地方雖沒有增加，但農民收入下降了，相對負擔卻是年年加重的……

七、謊言講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現在真話無處說。上級領導只聽農民增收就高興，匯報農民減收就批評人。有典型，無論真假，就記錄、就推廣。基層幹部觀言察色，投領導所好，到處增產增收，形勢大好。所以真話也聽不到了。如果有人講真話、實話，馬上就有人給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給您寫信報告基層情況是一名基層黨員應做的工作，是講政治、講正氣的表現，是符合黨章規定的。可是我卻經歷了近三個月的思想鬥爭，因為我自己也覺得給您寫信是「不成熟」的表現，是「靠不住」的表現……現在作為一名農村基層幹部不出假典型，不報假數字，不違心說話，不違心做事，做實事求是的幹部太難，太難啊！

……

(來論)

官話大觀

劉洪波

官話兇猛，大家都是知道的。

官話兇猛的第一個表現是官氣重，官氣重則口氣大，豪氣可以吞了天上的牛斗，地上的東西和人間的東西就更不在話下。事情遇到矛盾，官話大抵要說：

“這是英明決策，已經決定了的事情，執行不能打折扣，死人發火也得做，天上下刀子也得做”。

官話兇猛的第二個表現是正確率高，隨便找個漂亮帽子一戴，就無往而不勝。例如機關要經商，是“轉變觀念，適應市場”；機關不經商，是“當好裁判員，不當運動員”。官員不能招聘，“怎麼能伸手要官呢”；當官又公開招聘了，是“變相馬為賽馬更公平”。

官話兇猛的第二個表現是極具“無賴性”。這一特性，可謂官話之根本屬性。按說，官是衣冠人物，與無賴很有一段距離的。然而，如果衣冠人物做事沒有道理了，說話也只好急而跳牆。有一句台面上的官話叫“依法辦事”，這句話翻譯成“心聲”也就是“拿著荊條去辦事”，辦得不順就不必“依法”了，取而代之的是：“造反了你不成，給我抓起來”。

雲南省建水縣圍繞著一批古建築是拆還是不拆，發生了很大的衝突。衝突的一方是縣委縣政府，另一方是縣城的百姓。這是一個典型的官民相峙事件，自然會有典型的官話與“民話”的交鋒。

“民話”以一首民諺最有典型，詞曰“明清建水出人才，進士科舉甲全滇；民國年間出土匪，現在盡出敗家鬼”。這當然有“以偏概全”之嫌，“現在盡出敗家鬼”，不符合“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的定論嘛，而且民國年間絕大部分人也不是當土匪。姑念民眾見識淺薄，達到了官們總害怕與之“混同”的程度，其打油詩“以偏概全”，也就高抬貴手不作細究吧。

絕不“混同於普通老百姓”的官話又如何？拆房理由如下：“為進一步加大旅游帶動型發展戰略的實施力度，促進我縣旅游業發展，縣委、縣政府決定將建新街改造建設成清式風貌街。建新街清式風貌街的建設，是振興建水旅游業，提高建水在全社會知名度的具體措施。”真是好公文，口氣是大的，正確率是高的。發展旅游業，提高知名度，都是好事啊，為之

“改造建設清式風貌街”實在不過分。這裡當然不能寫“拆除原版清代建築一條街，新建一條清式風貌街”，否則“正確率”就受損了，決定未經合法程序審批，也萬萬不可道及。

台面話似乎就此到了頭，由於群眾“搬出相關法律條文，指出政府的一系列違法行為”，接下來的官話，“無賴性”就成了主旋律：老房子，每年折舊2%，50年就全沒了，這些上百年的老房子，還補償你，算是政府的照顧。你們就是告，法院也不會受理，要土地房子沒有，阻礙拆遷要負法律刑事責任。不要說死人，就是棺材抬來也不怕……

不過，隨著《中國青年報》對這一衝突給予報道，建水的官話檔次好像又有所提升，重新回到了台面上。致函團中央及中國青年報社的水平，使用了“強烈抗議”型號的外交辭令，嚴正指控記者“行為卑劣”、報社不負責任，定性護城百姓為“老上訪戶”（相當於“社會不安定分子”）、記者為“文痞”，又聲明報道“造成了全縣幹部群眾思想的極大混亂，毀壞了建水縣的對外形象，嚴重干擾了建水縣改革開放的各項正常工作，擾亂了全縣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傷害了全縣48萬各族人民的感情”，並要求“不負責任”的報社立即派“資深記者”前往作“正面報道”。

雖然這裡充滿了歪曲與倒打一耙，但其“無賴性”只是體現於邏輯上，而不是赤裸裸地表現於文辭了，比“棺材抬來也不怕”之類的混球話還是高一檔。

建水事件中的“官話”，型號齊全，有台面文章，有強詞奪理，有蠻橫無賴，也有倒打一耙，可謂洋洋大觀。唯一的缺憾是建水不是獨立行政區，否則那裡的官話還要祭出“內政不容干涉”的法寶來。這些官話就實質言，對治下的人民，它是堂皇其表，蠻橫其裡；事情鬧大了，它是虛張聲勢其表，倒打一耙其裡。

民話“以偏概全”，可能近於本質；官話千言萬語，往往無賴至極。

(來論)

我的兩次民主體驗

劉洪波

眼下美國大選正鬧得太歡，由不得我這個無業游民不注意。炸了咱大使館的美帝國主義終於自個出亂子了，中華兒女自然是要輕吐胸中些許惡氣。高興之餘，自然也想弄明白美國佬們在鬧什麼，老祖宗教咱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於是忍著幾頓飯不吃，兩宿不睡，買全了近期大報小報，訪遍了國內外各大網站，這才知道一切都是那“虛偽的民主”惹的禍。

民主是什麼，我至今說不清楚。但投票選舉應是民主最基本的表現吧，我以為。

第一次參加選舉投票時，我在讀高三。剛滿18歲，碰巧要開人大，選參加入大的代表。正上課間，教室門忽被推開，三人闊步而入。教導主任在前，捧著一個紅紙糊的箱子（後來知道，應叫票箱才對）；書記居中，拿著一摞紙片，有黃色有白色；校長端著一臉的嚴肅。三人中不知誰大喝一聲：“夠18歲的，舉手”我當時不明白發生什麼事，但還是怯怯地舉了手。四下偷窺，另外有幾只手也正顫微微高過頭頂。畢竟都是老實孩子，幾年以後我這麼想。一張黃紙片連著一張白紙片被拋到了我桌上。“快點，畫完繼續上課，圈那個女的！”原來，黃的是選民證，要自己寫上名字；白的是選票，要畫圈。恐懼中，匆忙中，我第一次的民主生活結束了。那個女的，當時沒看清名字，到今天自然依舊不知她是誰。

後來，我才知道選舉人大代表是憲法規定的年滿18周歲的公民的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是民主的標誌性體現。可惜在我心裡，這次選舉的感受要比初潮還淡上幾百倍。

上大學了，我的專業是法律。大一時就開了憲法課，同時學選舉法。想起上次的倉促，下定決心，一定要當家作主，投神聖的一票。

第二次選的是參加區人大的代表。箱子拎到我面前時，教室裡已沒有幾人，我仔細地看了選票，和後壁上的被選舉人簡介。默念到：我雖然沒有聽說過你，但我感覺你不賴，非常鄭重地畫了圈。陡然間，彷彿神聖的民主爬上了我的雙肩。

結束了吧，我這樣想。不料卻被總支書記熱情地拉住，“幫個忙！這麼多人沒到，替他們畫個圈兒。”

“這不行吧，法律上……”我小聲講，有些猶

豫。

“你不是要求向組織靠近嗎？”我的確是交了入黨申請書。畫圈果然是容易的，一百多張票，不到十分鐘就完成了。

下一節的憲法課上，平素學識淵博、口若懸河的教授少了往日的風采。講完了基層選舉，他問到：“請舉手，昨日參加了選舉的！”懶懶地舉起了手的，寥若晨星。

“我棄權了，但願能成功，而不是被強姦。”他莫名地揮揮手，示意下課。路過宣傳欄時，有新稿貼上，雲本系選舉工作圓滿完成，教工學生全數參加，且無人棄票，民主如此體現，人民就此當家，等等。

強姦?!我也是強姦者麼？或者我也是被強姦的吧，被強姦了的我被逼著同強姦者一道又強姦了如我一樣幼稚的人們。我自以為會摸到了民主的皮膚，其實不但民主沒觸到，就連看也沒看見，我只是認真地做了一回反民主的幫兇而已。忍不住的面紅耳赤，還想踹自己兩腳。

從歷史教科書裡，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讀到了“強姦”這一詞，所指的是1945年蔣介石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修憲時的所作所為。

中國人是講儒學的，這樣不入眼的話兒自然是不會常有機會看見聽到；但中國人同時又是含蓄的，經歷了任何事都能不動聲色。

最近報刊上，有人講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為，不外乎大環境之下意料之中概莫能外、今日想來年輕氣盛有點過火，請多海涵，頗有綠林好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意。我是70年代中期出生的，先天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多少深切的體會，後天又才疏學淺，對於民主抑或反民主也只有這兩點經歷。原以為沒機會為外人道，但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這樣引人注目，又新交了美國朋友，看他遠在上海還眼巴巴地等選票寄來，又屁顛顛地寫票，最後自己花銀子寄回去，眼紅嫉妒氣憤之餘，就想說兩句。

這樣寫下來，也希望能夠引起人民的注意，並以引為戒吧！

印尼：民主被出賣了！

畢圖

兆立譯

蘇哈托貪污案的主審法官，在聽了法庭所指派的23人醫生團說這位印尼前獨裁者因身體、精神狀態欠佳不宜受審的報告之後，竟完全出賣學生領導的改革運動，把這個審判停頓了。

這個消息傳出了以後，印尼的首都雅加達就發生了暴亂：憤怒的反蘇哈托的抗議者與蘇哈托的支持者起了衝突。1998年，學生所領導的示威遊行推翻了蘇哈托。自從那時以後，他們一直在要求，他應該為他的罪惡受審判。

蘇哈托在法庭的三次開庭中都沒有出席。他的律師辯稱，他病得太重了，所以無法回答複雜的問題。撤銷這個案件的南雅加達地方法庭主任法官Lalu Mariyun責怪檢察官們沒有把蘇哈托帶上法庭。受到挫折的檢察官們則發誓要向雅加達高等法院上訴。

蘇哈托被控以貪污和偷竊國家資金5億7千1百萬美元的罪名。他還沒有被控以在他專制統治的30多年中無數次的謀殺、綁架、拷打和其他違反人權的行動。

在這同時，蘇哈托的兒子「湯米」，因與主要的糧食供應機構布洛格做了一筆醜惡可恥的土地交易，致使印尼政府損失1,120萬美元，因而最近被判決犯貪污罪。〈1〉他承認犯了錯誤，要求瓦希德總統寬恕。他只被判決服18個月的刑期。

蘇哈托之成功地裝病到「不宜受審」、他只被控以貪污罪（不是違反人權罪）和湯米·蘇哈托之被輕判，都凸現了印尼的一個危險現實：由高級軍人們、蘇哈托的家人和密友們所代表的舊統治精英力量，仍然抓住大權，仍然具有大的影響力。正如我將要在下面所證明的，他們試圖通過一連串的暴力、恐怖行動來破壞現政府的穩定。

但是，另外一個現實也可以在雅加達和其他城市的街頭看到，特別是在高中和大學的學生中間——日漸對激進思想和一般政治發生興趣。

激進思想的散佈

我第一次訪問印尼，是在1997年5月的議會選舉

時。蘇哈托還在掌權，他的戈爾喀黨又在一次騙人的選舉中大獲全勝，親民主和工會的積極份子們正被送入監獄。

我在那個時候會見了正在秘密組織反對蘇哈托政權的學生們和其他積極份子。人們講話非常小心，很少積極份子公開談論政治或政治思想。

自從那時以後，局勢改變了很多。學生領導的改革運動推翻了蘇哈托，這個國家舉行了44年來的第一次選舉，而現在就有了許多、或許是大多數印尼人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政治自由。

但是，當我今年到了印尼，看見學生們穿著印有威·格瓦拉和陳·馬拉卡（Tan Malaka，一位印尼的革命社會主義者）〈2〉的畫像的T形運動衫的時候，我還是大吃一驚。書店在顯要地方陳列關於馬克思、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和批評瓦希德總統的書籍。

人民協商大會會場門外的示威遊行者在唱著「貫徹革命、誓死不屈」的歌。我所會見的許多積極份子說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左派團體，例如人民民主黨，正在日益擴大。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小團體，像雨後春筍般的，在爪哇和其他島上到處湧現。

《雅加達郵報》報導，在人民協商大會最近一次年會上，關於共產主義和左派人物的書籍，是會場的一個小書亭上賣給議員們最多的東西。〈3〉

我當然不相信左傾思想會是這樣時髦的。但是，這一切有什麼含意？對激進思想發生興趣的，大都是積極份子和學生。這些思想在大多數印尼人中並不普遍。可是，對政治有興趣的人倒很多。

過去，在蘇哈托的統治下，一般人民很怕捲入政治之中。現在，政治討論、政治評論的節目充滿了印尼的電視。政黨的旗幟（在爪哇，副總統梅加瓦蒂的印尼民主鬥爭黨的旗幟最普遍）在屋頂上、船桅上和村莊大門上飄揚，將天空點綴得五彩繽紛。

政治傾向，例如人民民主黨及另外幾個團體，正試圖找到方法來好好利用人民對政治的興趣，將工人們和其他社會集團動員起來，進行社會和政治的基本改變。可是，現在（還）沒有任何擁有相當數量的積

極份子、得到群眾支持的組織，能夠把人民的渴求的焦點集中在爭取民主、土地改革、公平待遇、結束貪污、結束軍人專權和其他要求上。

在那個推翻蘇哈托的學生示威遊行期間，由於需要和方便，聯盟成立起來了，但是沒有一個有相當規模的、長遠性的組織能夠維持下去。積極份子們向我埋怨說，因為蘇哈托現在不再是總統，他們還沒有能夠找到一個目標將人民匯合起來。

學生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已經把他們所提出的許多切斷新秩序勢力的權力的要求，積極地貫徹到底。（蘇哈托稱他的政權為新秩序。新秩序勢力通常是指蘇哈托的戈爾喀黨和印尼軍方。）

土地鬥爭及罷工

新秩序勢力的權力現在真的是受到了削減和抑制。多年來，軍方的行動是不受懲罰的，工廠老是以威脅和暴力來對付工會活動的。

蘇哈托政府偷走農民的土地，將它賣給大公司。資源例如阿齊（在蘇門答臘島的北端）的天然氣和石油、巴布亞島西部（即伊里安查亞省）的金和銅被從外島上偷走，使印尼精英份子和跨國公司得利。

現在，罷工正在這個群島的許多地方爆發，分離主義運動的勢頭正在阿齊和巴布亞島西部擴大，而農民們正在要求取回（在有些地方已經拿回）過去被偷走的土地。

我在蘇門答臘島南的班達蘭龐附近遇見了已把土地要回的農民們。他們的土地本來被一間木薯澱粉加工廠名叫蘭龐顆粒工廠所偷走。蘭龐顆粒工廠是達馬拉集團的一部份。（達馬拉集團是一間以雅加達為基地的、擁有多種多樣從快餐餐館到財務公司的、巨大的聯合大企業）

1970年的一天，這個公司沒有與農民們協商，也沒有向他們補償，就在半夜裡用推土機來挖平他們的土地。軍隊提供了保安工作，阻止了農民們截停推土機。在蘇哈托時代，軍方威脅農民，如果農民要討回土地，就說他們是「共產黨」。所以，在蘇哈托統治的30幾年期間，農民們是沒有辦法進行公開鬥爭的。

在90年代初，學生們開始建立與農民們的聯繫，而在1998年，農民們以改革運動的要求為中心與學生、工人及其他積極份子們連結起來。在土地被偷走的22個村莊中，19個村莊已經憑藉著與其他社

會團體的團結以及成立他們自己的農民組織POSKO，把他們的土地爭取回來。

這個鬥爭已經把當地人民變得激進了；而他們的成功更使他們勇敢起來。一位農民的家的牆上有人用印尼文寫了這樣的標語："誰要與改革運動搗蛋，就會受到POSKO的回擊"。

新秩序勢力對這些發展很不高興，要"舊日子"倒回來。至少，他們要維持他們現在仍舊擁有的權力。所以，極端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他們的巨大的權力。新秩序勢力對印尼的民主仍然是一個威脅，而且正在使用各種各樣的策略來保持、恢復他們的權力。

軍方緊緊抓住政治權力

一個策略就是維護軍方在政治領域的權力。我在人民協商大會的年會期間是在雅加達。議員們在有刺鐵絲的柵欄後面、防暴警察的保護下，投票贊成把人民協商大會中軍警派系所持有的、本來要在2004年撤消的席位，保持到2009年。這就出賣了改革運動的中心要求之一——結束印尼軍警的政治權力。

另一件對軍方的激勵，是憲法的一個修正案：確定軍方的任務是保衛"國土的完整"。這個修正案將會被用來證明對阿齊和巴布亞島西的被指控為分離主義者的暴力行動是正常的。

印尼軍方在人民協商大會中最大的勝利，也許是對印尼憲法的這樣一個修正案的通過："既往不究的權利是一個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違反的基本人權。"<4>

這個修正條款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還在爭論中，不過，人權組織已將它解釋為禁止應用任何法律來追究既往。司法部長達魯斯曼聲稱，這條新修正案只是防止任何新的法律追究既往。<5>

這個修正案可能使前陸軍司令維蘭托將軍不會因他在去年東帝汶的民兵的血腥狂暴行徑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法律的懲罰。目前，沒有什麼證據證明維蘭托直接下令屠殺和轟炸。目前的證據只是指向維蘭托知道他的軍隊武裝訓練民兵，不過，一旦民兵開始進行暴力行動時，沒有阻止它。

印尼的法律專家說，這樣一種忽略的行動在印尼不是不合法的。印尼的議員們正在討論訂立新的人權法，使這種行為構成犯罪行為。但是新的憲法修正案會阻止新的法律追究過去的犯罪行為。

事實上，維蘭托的名字並沒有在司法部長辦公室

於9月1日所發佈的19名嫌疑犯的名單上。民兵的首腦們和當時的情報主腦馬卡里姆的名字也都沒有在此名單上。人權團體已經譴責這些忽略是有政治動機的。被列為嫌疑犯的軍官們的代理律師們，計劃使用新修正案來替他們的委託人辯護。

憲法的修改以及人民協商大會中的軍警的角色的擴大，都在沒有爭論或異議的情況下通過了。

政治觀察家薩尼特告訴《南華早報》說，延長軍方在人民協商大會中的角色是危險的，因為軍方已經強大了。他說，"如果我們讓他們繼續逗留，他們會要求更多。應該受責備的是政客們，……因為他們自己應當感到羞恥"。〈6〉

人民協商大會中最大的黨派、副總統梅加瓦蒂的印尼民主鬥爭黨的成員們不把議會大門外的反軍方的抗議行動當作一回事，拼命地替他們的在議會保持軍方和國家警察的席位的決定辯護。據美聯社報導，議員們私底下說，他們是被強硬的將軍們逼迫通過這個親軍方的措施的，因為後者威脅著要在阿齊、馬魯古和巴布亞島西等地挑起事端，除非他們要怎樣就怎樣。〈7〉

事實上，軍方已經在那些及其他地方無法無天了。去年，軍隊在東帝汶資助、訓練武裝反獨立的民兵的暴力行動。軍隊也一直拒絕叫這些同樣民兵停止在西帝汶的難民營中的活動。當民兵在9月1日把難民營中3名聯合國工作人員砍死的時候，軍隊和軍警都站在旁邊視若無睹。〈8〉

這就是新秩序勢力為了保持權力而正在使用的另一個主要策略：以在外地鼓動暴力（如許多人所說的）在首都使用炸彈來製造不穩定。

阿齊和巴布亞島西

在阿齊這個蘇門答臘島最北端的印尼省份，由於軍方十年的暴力運動、雅加達和像Mobil這樣的跨國公司之偷走該地區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要求獨立的呼聲日益響亮。

自由阿齊運動是一個主張用武裝鬥爭來脫離印尼而獨立的反叛組織。一個不隸屬於自由阿齊運動、主張用公民投票而不用暴力行動來達到獨立的運動，在1998年底興起。〈9〉這兩個運動都曾經面臨軍方的野蠻鎮壓。

自由阿齊運動與印尼政府商談出三個月的停戰期，可是，自從6月2日開始停戰以來，至少有119人

被殺。而且在停戰期中，有五位出名的阿齊社區領袖被綁架或被殺，包括Jafar Hamzah，一位以紐約為基地的、出名的阿齊人權積極份子。

在蘇門答臘島北部的棉蘭被綁架以後，他的屍體以及其他四個人的屍體被發現遭到野蠻的拷打，他的雙手還被綁著。他屍體經過剖檢後，才被證實是Jafar。

在群島的另一端，在巴布亞島西部（伊里安查亞），人民也在要求獨立。這個區域，像阿齊一樣，自然資源也很豐富，可是人民得不到利益。資源雖被開發，但是得利的，是中央政府和跨國公司，例如以美國為基地的Free port McMo Ran銅、金礦公司。

儘管那裡有著正當合理的獨立要求，新秩序的人物最近卻在巴布亞島西的獨立運動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離奇古怪的角色。

拉韋亞伊是一個由流氓、暴徒組成、以替蘇哈托做卑鄙勾當而臭名昭著的組織Pemuda Pancasila的副會長。有人指控，拉韋亞伊在1996年7月27日命令他的暴徒，在軍方的支持下，攻打梅加瓦蒂的民主黨的總部。

在這個暴力行動中，至少有5人被殺死，149人受傷，有些民主積極份子到今天為止仍舊下落不明。為了這次攻擊，拉韋亞伊正在等待審判。

但是，現在，拉韋亞伊卻通過一位自稱的領導人埃盧亞伊及其黑衫民兵來資助巴布亞島西的獨立運動。〈10〉

一個忠於蘇哈托的組織的領導人為什麼會支持巴布亞島西的獨立反叛份子呢？埃盧亞伊本人原是戈爾喀黨的一位黨員。他在1969年投票贊成與印尼合併。像東帝汶的回音一樣，現在也有軍方在巴布亞島西部份地區訓練忠於雅加達的民兵的傳聞了。〈11〉

結束美國的軍事援助

我們在美國能夠做些什麼來支持印尼的積極份子呢？我們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迫使美國政府不要資助、訓練或供應印尼的軍方或警察。

雖然目前國會有禁令暫時停止這些聯繫，但是恢復這些聯繫的呼聲時有所聞，而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已向雅加達作出某種試探性的主動表示，例如提供醫療訓練、准許印尼軍官觀察軍事演習。〈12〉

印尼的人民正向一個專門鎮壓人民、捲入社會各個層面的軍方鬥爭。軍官當企業的老闆，當政府的官

員，開妓院，不尊重人權或印尼法律。軍方根本不受平民的監督。

自從1975年以來，美國已經給了印尼軍方超過10億美元。這筆錢已經訓練了、裝備了一個野蠻的軍方。我們決不應該讓美國繼續捲入綁架、殘殺和嚴刑拷打的勾當。我們必須以拒絕援助這個軍方來粉碎它的權力。這樣做就會讓印尼人民對於要建立何種型式的社會作出他們自己的選擇。

註釋：

*Kurt Biddle是每三個月出一次的時事通訊《Indonesia Alert!》〔《印度尼西亞警惕啊!》〕的編輯、最近成立的印度尼西亞人權網絡的一位董事。他最近到印度尼西亞旅行了一個月，訪問了積極份子們、工人們和農民們。《印尼警惕啊!》的訂閱費是15美元，可寄至Indonesia Allert! PO Box 267, Oakland, CA 94604-0267。Kurt的電子郵址是editor@indonesiaalert.org。《印尼警惕啊!》的網址是www.indonesiaalert.org。

<1> 見2000年10月6日的《Indonesian Observer》報上的"湯米·蘇哈托不久將進監獄"一文。

<2> 陳·馬拉卡本來是印尼共產黨黨員。他於1923年被共產國際任命為其在東南亞的代表。他因不同意印尼共產黨決定在1926、1927年發動以創造一次全印尼範圍的革命為目的的暴動而離開該黨。他離開了印尼共黨之後仍在政治上活躍，而且於1945年參加了印尼的民族革命。欲知關於陳·馬拉卡的詳情，見Ruth T McVey的《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的興起》（Ithaca，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65年）和陳·馬拉卡著、Helen Jarvis譯成英文的《從牢獄到牢獄》（俄亥俄大學出版）。

<3> 見2000年8月9日的《The Jakarta Post》〔《雅加達郵報》〕上"共產主義書籍是人民協商大會會場上的暢銷貨"一文。

<4> 見Vaudine England在2000年8月19日的《南華日報》上所寫的"Military Chiefs To Escape Prosecution"〔"軍事首領們將可豁免受控"〕一文。

<5> 見電子網絡www.tapol.org上TAPOL的2000年8月18日的新聞發佈"Suharto and Military Win Immunity from MPR"〔"蘇哈托和軍方從人民協商大會爭取到豁免權"〕。達魯斯曼的評語則在2000年9月14日的遠東經濟評論的"Long Journey To

Justice"〔"到達司法公正的長遠路程"〕一文中。

<6> 見Vaudine England在2000年8月14日的《南華日報》上所寫的"Army to Entrench Political Power"〔"軍人將鞏固其政治權力"〕一文。

<7> 見美聯社記者Slobodan Lake於2000年8月18日報導的"Indonesia's Military Win Concessions From Top Assembly"〔"印尼軍方從最高會議贏到讓步"〕一文。

<8> 見2000年9月25日法國新聞社的"Indonesia Risks Losi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Over West Timor: US"〔"印尼會有因西帝汶而失去國際支持的危險：美國"〕一文。

<9> 見2000年冬季號的《印尼警惕啊!》內Cazwil James所寫的"Arceh Independence"〔"阿齊獨立運動進入新階段"〕一文。

<10> 見《Sydney Morning Herald》〔《雪梨晨先驅報》〕2000年3月6日的"Going West"〔"向西方走"〕一文。

<11> 見2000年8月6日（英國）《觀察家》上Ian Williams的"Stone Age Rebels Risk Wrath of Indonesia"〔"石器時代的反叛者冒著激起印尼憤怒的危險"〕一文。

<12> 路透社記者Charles Aldinger 2000年9月17日的報導"Cohen to Warn Indonesian President Over Militias"〔"美國防部長科恩將就民兵一事警告印尼總統"〕。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左派的出版事業：一支新火焰

畢圖、納爾*

兆立譯

閱讀左派的書，在印度尼西亞已經有點變成一種風氣了。雖然爭取民主的鬥爭還沒有完全勝利，1998年推翻獨裁者蘇哈托，卻為人民帶來了許多正面的變化。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人民能夠公開地探索各種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獲得閱讀各種不同的資料的權利。

最近出現了好幾個出版者來滿足這個需要。他們大都是看到這些書對印尼的鬥爭非常重要的積極份子。其中一個出版者是「小燈」（Teplok）出版社，一個具有有趣的歷史的小出版社。

小燈出版社的負責人阿古斯·森托索解釋了Teplok這個名字的意義。（他在積極份子中被稱為「阿古斯·列寧」。）「在蘇哈托統治時期，我們秘密閱讀、討論和研究左傾的書籍，例如《共產黨宣言》、陳·馬拉卡的著作，以及被認為是危險的書籍。我們在晚上在秘密地點進行討論，例如在公園裡或者在掩蔽的房子裡，點一盞小燈作為照明。這種小燈，印尼文叫Teplok」。

討論左翼書籍的小讀書會是1980年代後期開始

出現的，首先在約格亞達和雅加達，然後在萬隆和梭羅。

今天人們對這些書籍的興趣很大。Teplok出版了許多左翼書籍，例如格瓦拉的《人民的革命》、陳·馬拉卡的自傳《從監獄到監獄》、Anthony Brewer的《馬克思資本論指南》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小燈」的辦公室設在東雅加達。那裡的工作人員都是年青人，大多數是運動的積極份子。他們還有好幾本書要出版的，包括陳·馬拉卡的另外幾本書。

「小燈」的書是通過兩個管道來分發的。一個是商業管道，主要是大書店；另一個是直接由積極份子傳播。這兩個管道合起來，涵蓋了大部份的印尼。

*納爾Rivani Noar是一位印尼勞工運動者，他把替阿迪達斯運動鞋廠製作零件的家居工人組織起來。

〔兆立譯，以上兩文同譯自《逆流前進》2000年11/12月號（總第89期）〕

日本2001年度軍事預算案 與中期防務整備計劃

高島義一

今年3月3日，以森喜郎為首的聯合政權強行通過了2001年度（2001年4月1日開始）政府預算案。其中的第二期《中期防務整備計劃》與首年度2001年軍事預算案，除了反映日趨腐敗的產業、軍事複合體吞食國民稅金外，也標明著在經歷新防務指南、

「周圍事態法」、緊急立法、憲法修改策動後，日本的「自衛隊」正在向侵略性的、可以在海外展開大規模作戰能力的體制過渡。

去年12月15日內閣會議批准的《中期防務整備計劃》（2001至2005年）主要強調強化信息技術、

生化、核武器防備、災害緊急派遣、部隊改編等，撕破了憲法外表下的「專守防衛」路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稱為「載直升飛機的護衛艦」，即輕型航空母艦。此艦可同時搭載四架MH53E（全長三十多米、容納五十五名士兵）的大型直升飛機，滿載排水量近兩萬噸，與英國的航空母艦相等，比意大利的航空母艦還大。如果載上美國正在開發的直升殲擊機JSF，這就是攻擊型航空母艦了。

另外，目前海上自衛隊尚沒有獨自指揮大規模艦隊群整體作戰的旗艦。《中期防務整備計劃》也計劃利用高技術使日本能夠擁有美第三艦隊指揮艦那樣的指揮中樞機能。目前，海上自衛隊有一艘強襲登陸艦可運送18輛90型坦克三百三十名士兵，三井與日立公司正在建第二、第三艘。《中期防務整備計劃》還計劃再裝備兩艘Aegis驅逐艦。這種驅逐艦可以同時攻擊多個目標，目前全世界只有9艘（每艘1200億日元），日本已經有4艘在服役了。

《中期防務整備計劃》還決定裝備4架空中加油機，這也打破了歷代自民黨政府的禁忌。1972年11

月7日，增原防務廳長官曾經在國會答辯道：不能容許裝備深入鄰國領海、領空攻擊或爆破的這種飛機。但是，日本政府看到99年美國空軍從本土出擊、由加油機空中加油，直接爆破南斯拉夫的威力，也期想日本能有這種攻擊性作戰能力。

隨著俄羅斯海軍的迅速衰退，海上自衛隊在裝備數量、質量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二號海軍。它的巡洋艦與驅逐艦有52艘，已經超過英國的34艘，與美太平洋艦隊（58艘）相等。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二大軍事預算大國，《中期防務整備計劃》表現出日本進一步成為世界第二大軍事國家的轉變。制約日本軍事大國化的，只有美國的世界霸權戰略：日本不能強大到足以挑戰美國的程度（如開發核武器）。

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已經被踐踏得面目全非的憲法成為阻止日本進一步軍國主義化的唯一可以、必須防護的武器。如果日本的統治階級得以修改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亞洲的和平基礎就不存在了。

（趙京節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1年3月12日號）

沖繩右派排斥反戰人士、掩蓋侵略罪行

平井純一

清除一坪反戰地主

3月30日，沖繩縣議會在執政黨自民黨、縣民會、新進的議員佔多數票的情況下，通過了由推廣國旗國歌沖繩縣民會議等右翼團體提出的、要求將一坪反戰地主〔譯者註：為反戰而各自購買一坪（約3.3平方米）被選定的土地，以聯合阻止在該地上建造軍事基地的人們〕從縣機關及其外圍團體中清除出去的陳情書。一坪反戰地主會隨即發表了抗議聲明。

那份陳情書提出，「一坪反戰地主持有該土地的目的是……為了阻礙執行國家政策，因此違反了憲法第十二條」；「縣祈求和平資料館監修委員會委員、縣公文館工作人員、縣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都特

別要求具有歷史的公正感。因此，像一坪反戰地主那樣的人物是不適合擔任的」。

那麼，表決通過清除一坪反戰地主的陳情書的目的究竟何在呢？這還要從正陷入窘境的以稻嶺知事為首的沖繩縣政府所幹的事說起。他們在沒有與負責縣祈求和平資料館展出工作的監修委員會商量的情況下，就指示新的祈求和平資料館更改有關沖繩戰役中日軍殘酷屠殺島上居民，以及駐島美軍犯罪問題等方面的展出內容，而在99年8月遭揭露，被輿論批判得無路可逃避。結果，新資料館的展出內容基本上按最初的設計方案對外開放。

縣祈求和平資料館監修委員會於3月23日召開全體會議後，向縣政當局提出了十二項要求的請願書，

包括不能隨意更改展出內容、新館開館後現任委員繼續監修、讓監修委員參加資料館經營協議會等。而表決通過那極不正當的要求清除一坪反戰地主的陳情書，就是為要支援正面臨上台以來最大危機的縣政當局，鼓動它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而不顧輿論的竭力反對，強行篡改沖繩戰役及其前後的歷史。提出陳情書的右翼團體會長惠忠久，就露骨地說了他們的意圖：「由於去年的資料館問題，產生了監修委員續任的問題。監修委員會中有一坪反戰地主。如果縣議會能通過的話，縣知事也考慮了還是撤換監修委員更為簡單吧」（《琉球新報》3月31日）。

篡改資料館展出內容

去年下半年在沖繩，八國首腦會議、美軍機場遷址（新建美軍基地）、新的祈求和平資料館的問題，成為相互關聯、引起重大爭論的三個焦點。在沖繩的名護市將召開八國首腦會議，在該市的邊古野地區將建美軍基地，以及指示更改新的祈求和平資料館的展出內容，這三件事具有內在的關聯，都是貫徹日美兩國政府根據《美日防務合作指針》這一新形式的安保條約，半永久地保存並強化沖繩美軍基地的意圖。

變更新祈求和平資料館的展出內容這個問題是怎麼一回事呢？

99年8月11日的《琉球新報》頭版頭條，報道了沖繩縣當局未與縣祈求和平資料館監修委員進行任何聯繫就指示更改展出內容的情況，同時披露了建於該縣石垣市、已於同年5月28日開館的八重山祈求和平館的展覽，其文字說明等也被大幅度更改的情況（比如，將居民的「被日軍強制驅離」改寫成「避難」）。

對新的祈求和平資料館的展出內容所做的大量更改中，光是全部改動或刪除的就至少有二百二十二處。例如，對一座反映沖繩戰役中島上居民躲避在壕溝中生活的模型，將其中持槍看管、刀尖槍口直指居民的日本兵的雕像手裡的刺刀步槍拿走了；又如，將文字說明中居民的「被日軍屠殺」改寫為「犧牲」；等等。

在關於「二戰」前的沖繩的展出部份，刪除了有關進行「皇民化教育」、日軍的歧視性沖繩觀的內容；它還大幅地刪除了有關日軍在亞洲、太平洋戰爭

中進行侵略、屠殺、殖民統治的內容；並將題為「照相機鏡頭捕捉到的日本的加害」，反映了日軍在南京、731部隊、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屠殺行為的攝影圖片完全刪掉了。

在關於「二戰」中沖繩戰役的展出部份，除了前面講到的「被日軍屠殺」改成了「犧牲」等以外，還刪去了日軍把沖繩人看成奸細、屠殺朝鮮人和台灣人等內容。

在關於「二戰」後的沖繩的展出部份，刪除了送給日本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提議由美軍對沖繩進行佔領、指揮並長期統治的「天皇的意見」。縣當局還要求「不能只展出反對安保條約的內容，還應該展出安保條約所起的作用（如亞洲的維持和平部隊等）」以及「美軍統治的有利面（如建立了琉球大學等）」。

上述的此類篡改或刪除，都是在所謂不能反日、不能批判國策、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不能違背國家的認識和意旨等執政者的指示下，以及右翼團體的攻擊後進行的。這些都不只是在沖繩，也不斷發生在全國各地的戰爭資料館的展覽中。「圍繞歷史的記憶的鬥爭」仍在激烈地進行。

（馮克瑞（<http://cpri.tripod.com/feng.html>）從日本新時代社2000年4月17日發行的第1629號《橋樑》週刊第4頁所載平井純一的文章《清除一坪反戰地主的沖繩縣議會決議及祈求和平資料館問題》中節選部份章節，譯於同年5月22日、23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並換了標題。）



「日の丸・君が代」法制化反対運動

日本革命運動內部的「肅奸」與人權

樋口篤三

在天皇制國家權力之下的日本革命運動，完全談不上什麼情報戰略，總是在歷史上要求革命運動領導人民時，被「特別高等警察」等一網打盡。在日本國家權力宣告投降的短時期內，有不少日共黨員、革命人士得以進入司法、行政、立法的握有一定資源的職位。但這些人都被日共如實地按照政府法令登記報告，當美國佔領軍改變政策、扶持被打敗的日本統治階級時，這些在行政、司法部門的人便被一掃而盡。

在國家權力高壓之下，革命運動內部瀰漫著疑心重重的氣氛，在「肅奸」中演出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

增山太助的《戰後左翼人士群像》記載到：1932年日共在工會中強制推行「打倒天皇制」計劃，為此從肉體上消滅反對強制推行的工會積極份子。其中，在朝鮮人最受信賴的「全日本勞動工會協議會」的尹基協被日共中央委員會以一票之差斷定為內奸而被射殺。當日共中央的紺野與次郎命令日共東京分部負責人村上多喜雄執行決定並交給村上上槍時，村上強烈抗議：「尹絕對不是內奸！」「黨中央內有內奸！」結果，尹基協被混入日共的最大內奸松村（真名飯塚盈延）槍殺。半年以後，特高警察借此機會一舉逮捕四千五百名工會協議會成員，把整個協議會摧毀。曾是日共政治局委員的白川晴一回憶此事時總是落淚不止：「村上與尹都是優秀的黨員啊！」

更可悲的是，協議會幹部松原（本名宮上則武）、平安名常孝連日共黨員都不是，卻因為不推行日共計劃被定為「超級內奸」、被趕出協議會並遭到日共的審問。

1933年12月，日共中央委員逸風重雄（第三號負責人）、宮本顯治（第四號）、候補中央委員袴田里見（第五號）審問中央委員大泉兼藏（第一號），小畑達夫（第二號），結果把無辜的小畑殺害，把真的內奸大泉放掉，後來宮本等又被警察抓進牢裡。袴田被日共開除後，在《致昨日的同志宮本顯治》（新潮社1978年出版）中，詳細敘述宮本是用柔道功夫把小畑殺害的。

由紺野與宮本等人開始的殺害「內奸」傳統在戰後變成私刑式的黨內審問。1951年2月，日共東支分部負責人戶塚秀夫、不破哲三、高澤寅男被日共隔離

審問兩個月，遭受了殘忍的暴行（安東仁兵衛著《日本共產黨私史》）。

當然，日共史上最大的「內奸」事件是伊藤律冤罪事件。

伊藤於1953年被「日共中央委員會」以「內奸」罪名開除，但此「中央委員會」本身後來被宮本主持的六屆全體協會判定為「德田分派北京機構」。後來日共的《五十年史》、《六十年史》、《六十五年史》都不提伊藤是「內奸」，而用「攪亂者」稱呼。「攪亂者」與「內奸」當然有本質不同的政治意義。

日共之所以無法明確稱伊藤是「內奸」，是因為伊藤在長達27年的北京監獄中始終沒有認罪。當時日共北京機構的負責人袴田在牢中不斷脅迫：「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要認罪，就可以保住性命。」（《伊藤律回想錄——北京幽禁二十七年》）。伊藤不但沒有認罪，當1980年9月被中共政法負責人喬石接見宣佈釋放時，伊藤還以為「組織」決定派他回日本從事革命呢！

當時，幾乎百分之百的黨員相信「黨中央」的決定，認為伊藤是內奸。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到這是日共黨史上最大的冤罪，開始為伊藤恢復名譽而活動。與伊藤共同工作過的日本農民運動領袖（組織最有戰鬥性的常東農民運動、當過兩次國會議員）山口武秀在伊藤的追悼文中憤慨地批判宮本以及日共組織的非人道性。「馬車夫國會議員」木村榮（1947年四名日共國會議員之一）見到伊藤時不住地流淚，責罵宮本「不是人」。當野阪參三因為在蘇聯出賣同志的證據被發現而被開除後，日共又詭稱伊藤的命運是野阪參三與周恩來決定的，日共中央委員會無法負責。

與宮本至今為止的頑固態度相比，曾經參與處分伊藤的藤井冠次（原NHK工會負責人）深為自己的罪過內疚不安，害得自己也腦充血、語意表達不清。

連基本的人權都得不到尊重的革命運動內部，還談得上什麼「同志之愛」？

（趙京摘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1年1月29日——2月19日號）

女性領導運動前進

卡爾娃

全球女性反對貧窮與暴力大遊行2000年10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遊行十分成功，共有2萬人參加，其中包括有來自100個國家的代表，及來自美國各地的2千名代表。同日，在紐約，也有2000人在聯合國示威。只不過，這次重要的遊行幾乎被全球所有國家的新聞媒介置諸不理。

參加華盛頓大遊行的最大型外國代表團，是來自歐洲的大隊。早在前一天，即10月14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便舉行了為數3.5萬人眾的全歐女性大遊行，所以，她們在美國的人數，不過是之前一天的成功的縮影。此外，來自亞非拉地區也有許多朝氣勃勃的女性參加，她們中有許多是當地原住民，這當中包括有來自墨西哥恰帕斯州的250名女性代表。

遊行的女性，代表著自1970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浪潮的延續，以及新一代女性反對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貧窮和暴力，兩支運動的相結合。

大遊行的要求

在公元2000年的女性反對貧窮和暴力的大遊行有兩項主要特色：1、參加者都同意一個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對父權制的激進綱領；2、這次遊行是全球各國女性團體在4年來的努力達成的成果。

這次遊行的焦點集中在「貧窮的女性面貌」，遊行的共同綱領呼籲撤銷第三世界的負債、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方案。共同綱領在指出貧窮與侵害婦女的暴力的互相關係之餘，也指出了許多富裕國家仍然保留把女性視為「次等人類」的父權法律和政策，助長了婦女所受的暴力侵害，讓局面持續下去。

大遊行要求聯合國及其成員國採取具體措施來結束貧窮，及結束打擊婦女的各種暴力形式。又要求女性的權利受到真正的尊重，不分種族、性取向及社會、文化背景。

大遊行的綱領是相當的激進，但它採用的戰略，卻是向政府及國際間的和本國的政府機構進行遊說，這就使遊行有了弱點。之所以會有這種戰略，乃由於

這個全球大遊行是源出自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在那次大會後，由「加拿大魁北克省女性聯會」作出呼籲，共同組織一次全球大遊行。由於聯絡組織的婦女最先是來自拉非政府組織，所以大遊行也維持了進行遊說的戰略。

大遊行的源起

「加拿大魁北克省女性聯會」由於能找到經費，所以能夠在1998年召開會議，訂定和通過大遊行的綱領。那次會議一方面是氣氛熾熱，令人興奮，但也在怎樣作出決策的問題（用共識或投票）、是否納入女同性戀者的權利問題上產生衝突。由這些問題的衝突，反映了在籌組全球大遊行的過程裡，是排除了美國之外的許多代表，因而出現了無代表性和甚至是官僚運作的情形。

不過，持續進行中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衝擊，導致了廣泛的反響，例如：

——來自「第一世界」的女性，看到她們在1970年和80年爭取到的成果正在倒退，在社會服務方面大幅削減，使工作職位喪失、工作量加重；

——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看到由「國基會」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方案對教育和社會服務造成的破壞；

——來自戰火連天的女性，她們既是敵對士兵施行暴力的受害者，同時也成為了難民營難民的受害人。

在公元2000年全球女性大遊行框架內進行組織及活動的女性，一共來自全球159個國家，她們總共收集了大約5百萬個簽名，支持這兩項要求：消除貧窮，反對攻擊女性的暴力。這些簽名都呈交予聯合國。至於在各個國家，女性爭取本國特定的需要，從爭取設立最低工資法，到爭取開設女青少年教育中心的經費都有。

同時，大家也決定維持女性大遊行已建立起來的組織網絡，並且開始作出總結，對未來的行動前景作討論。在這方面，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組織有需要參

與其中，以發展一套更為鮮明的反資本主義的分析見解，以超越遊說戰略，超越對民族的和國際性的機構所寄予的誤信。在組織工作方面，也要在各國吸納更多的基層女性組織進入網絡，而這樣一來，也有會讓決策問題再次產生，以解決需要有一個真實的代表性的決策結構的問題。

婦女解放運動復興

由於1970年和1980年的女性主義者再次重投運

動，加上有來自「西雅圖的一代」的年輕女性的參與，女性運動的前景是有根據滿懷希望的。女性解放運動復興，已經回到議事日程之內。我們在1970年代的口號，仍然有待實現：「沒有婦女解放，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而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便不會有婦女解放！」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月號）

美國2000年大選的深層政治

喬姆斯基

美國公元2000年總統大選最令人震驚的事實，就是兩名主要候選人在統計上打成平手（在國會選舉方面，實際上也是這樣）。在這個競選和局裡，最饒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它呈現了美國的運作式民主目前處在怎樣的狀態。

在許多論者看來，總統一職繫於「上上落落的幾百票」這個事實，體現了美式民主的健全和勃勃朝氣。而另有一種見解，則認為，這正好是再一次確證，美國選舉根本不把民主觀念看作一回事。

在1億張選票裡平分秋色，兩個主要候選人各佔選票的一半，而其中，又有預期中的1-2%問題票的變數——是有怎樣的條件，而致使人們預期到這種局面？

產生這種預期的投票模式是十分簡單的模式：人們是隨意的投下一票。我們誠然可以堆砌出更繁複的投票模式，而何況最單純的投票模式也不一定嚴格有效。誠然是可以把各種各類的投票群逐一識辨開來，而投票者之所以作出某種選擇的理由，有時也可以考知。金融服務業所以一面倒地支持布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宣佈的未來大計裡，包括有把巨額的公共資源呈獻給這個行業；布殊並且比他的對手戈爾有更過之而無不及的允諾，他將會銳意破壞那些偽民主機構（尤其是針對社會保障制度）。

美國人民隨意投下一票

富裕的白人投票者支持布殊，而工會人士、拉丁裔人和非洲裔人則強烈反對布殊（用習用的術語來說，就是「支持戈爾」），這是不足為奇的。不過，若是談到投票群的實際投票，往往卻是不容易用利益作為依據來解釋他們的投票行為。而且更應該記著，投票更經常是有意識地反對利益的。例如，列根在1984年大選裡，是用一個「真正的保守派」的身份來競選，取得了所謂的「排山倒海的勝利」（是在不足30%合資格選民的投票下勝出）；有大比數的投票者是反對他的立法政綱，而有4%他的支持者是自視為「真正的保守派」。所以，從早年約50%到現在的80%人民認為，美國政府是「為少數人和特別利益而管治，而不是為人民而管治」，便不會使人太感到意外。況且，也有約80%人民認為，美國的經濟制度是「內在固有地不公平」，勞動人民沒有很多發言權，而且「國家有太多權力集中在大公司手上」。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的投票（倘若會去投票的話）便有可能是出於其他理由，而無關乎那些他們本來便不能夠產生什麼影響力的政策性的選擇。再加上傳媒和廣告側重於候選人的作風、個性及其他與國策無關的題目上大造文章，更會助長人民投票的上述傾向。

一些公共輿論的研究，也佐證了最簡單的投票模

式的可信性。由哈佛進行的一項「消失中的投票者研究計劃」，監察人民在大選整個過程中的態度。有四分三人民認為，整個選舉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贊助家（絕大部份是大公司）、黨領袖和公關行業所把玩的遊戲；是他們這些人爲候選人修身裝扮，教授候選人說出「足以使他們當選的任何言論」，所以，就算這些候選人對一些課題說得娓娓動聽，立場鮮明，人們也很難對他們寄以信任。而公民們在幾乎所有課題上，都無法認同那些候選人的立場。所以，假設人民在這次大選裡是在最簡單的投票模式下投以一票，可謂是對這場選舉的一項相當接近真相、相當公正的估計。而美國這個國家，現在較諸以往更被驅向於哥倫比亞前總統米高森對哥倫比亞本國所作的形容詞：這是一個由「同一個馬主擁有的兩頭馬」的兩個黨分享權力的政治制度。

這個形容，看來是受到普遍公認的。插句話說，或許就由於美國和哥倫比亞這麼相像，所以使我們可以明白，美國總統克林頓爲何對哥倫比亞的民主制度及那個由暴力來維持的荒唐的社會及經濟制度，是多麼的仰慕，稱讚有加。也所以會有這種事實：在過去十年來，哥倫比亞是西半球國家中收取美國軍火和軍事訓練最大宗的國家（相應地，也是違反人權最甚的國家）；來到1999年，哥倫比亞已經是全球收取美國軍火及軍事訓練之最多的國家了，這方面而且仍在與年俱進（以色列和埃及屬於另一種類別，此處不論）。

剝奪有色人種的投票權

當選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爲了沒有意義的數字遊戲，然而一個勝出者又必須要選出來，則這個理性的過程將會是一些隨意的選擇，譬如說，由擲角子來定勝負。可是這種做法是不會爲人接納的。有需要用堂皇的選拔程序把領導推舉出來。爲達成這個任務，足足花費了精工細琢的緊湊五週，不過，其呈現出來的成就，卻是相當的有限。但五週狂熱的努力不完全白費。它把在佛羅利達州及美國其他地方的種族偏私暴露出來——而且，這種種族偏私也有著相應的階級偏私的成份。美國評論界一貫否認有階級偏私、階級——種族偏私的存在，向來把這些偏私掩飾下去。除了對黑人選民所作的惡形惡相的滋擾和選舉詐騙這類選舉事態外，另外一些更爲重要的因素也受到起碼

的關注。這些重要因素是：經由囚禁而解除選舉權。

就在總統大選投票日的次天，「人權觀察」組織發表了一項（鮮有受到注意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佛羅利達州選舉中的「決定性」的因素，乃是該州有百分之31的黑人被排拒在投票行列之外；這31%包括了正在監獄服刑的黑人犯人，及40萬名永遠被剝奪投票權的「前罪犯」裡的黑人。據「人權觀察」估計，「總共有20萬名可能投票的黑人投票者，被拒諸投票行列」。而由於這些黑人通常都是會投民主黨的一票，所以，他們之被排拒，對選舉的結果便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他們的人數，是遠遠超過布殊和戈爾在佛州的票數差額之爭。

在其他搖擺在民主黨及共和黨兩黨間的7個州，也存在相同的問題。據「人權觀察」所述，在那些州裡，每4個黑人便有1人被「永久解除」了投票權。在全美國，「幾乎所有州都禁止囚犯的投票權」，而有「14個州，甚至在刑事罪犯服刑期滿後，仍然禁止投票」，從而，永久性被剝奪投票權的前度犯人，人數超過「1百萬人」。這些人，都是非洲裔及拉丁裔美國人，與人口乃至「罪行」皆不成比例。

兩位學術界人士在報告的結論裡指出：「倘若不是解除了重刑犯的投票權，民主黨是仍然會執掌參議院的」，而「要是布殊——戈爾的競選結果之會和甘乃迪——尼克遜之爭同樣的接近，而布殊又能夠竄身而出，我們也可將之歸因到重刑犯之被解除了投票權。」

「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看來都沒有興趣指出這個課題」。在共和黨方面，他們知道受影響的人壓倒性地會是民主黨的投票者，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會是无利可圖；至於「民主黨人，爲免被看成對罪案的態度軟弱，也不會在這個題目上大造文章」。這最後一點分析，指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過去8年來，克林頓和戈爾是解除了一個對戈爾競選非常有利的投票群。

克林頓執政製造罪犯

在克林頓——戈爾執政期間，監獄人口從1.4百萬躍升到2百萬。嚴刑峻法把數量龐大的潛在的民主黨投票人，從選民名單中劃掉。克林頓和戈爾對嚴刑峻法很是傾心，在他們的措施裡，首屈一指的是毒品法。這條毒品法的內容主旨是實施社會控制，而與掃

毒無關：消除多餘人口，威嚇其餘民眾。在1980年代末所設計的最新一次「掃毒戰」，在當時便已經被一個參議員認出是「我們選擇集中針對少數民族來個逼切的罪案問題。」而犯罪學家米高·唐尼寫道：「戰爭的策劃者完全知道自己的用意。」

在20年前，美國監禁人口的人數比率，是與其他工業國家大同小異。到了現在，在數字上已經是遠遠領先，無與比擬的了。在其他工業國家，同期間的監禁比率是保持穩定以至下降。而在美國，監禁比率的超升卻與犯罪比率毫不相干，反而卻是一種打從卡特總統任期末年已經開始的、有系統地施行的內政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構成部份，是屬於對第三世界造成災難後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另一種變奏。

並隨那些所謂「改革」而來的，是全世界所習用的「經濟健康」措施顯著地惡化，而且更在用來量度「生活質素」方面的社會指標受到重大的衝擊。據福威大學研究院就「社會衰退」所作的一項大型研究顯示，在美國，這些指標顯示了美國在把「改革」制度化之後，經濟再無增長，並且在繼後一直下降，時至今天，已回落到約40年前的水平。經濟回報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口，而許多人民則被利潤和權力視為多餘之物。多餘人口的邊緣化具有著多種形態。

其中某些邊緣化的形態，就是《商業一週》雜誌的封面故事的論題，如2000年10月23日該期所論述的「服務業為什麼敗壞」。文章提出，商科學校現在教授精益求精的80-20定律，即是提供80%利潤的顧客只佔20%，所以，若沒有其餘80%的顧客，盈利會非常好。這種新興的「消費者隔離制度」依賴現代的資訊科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不知情的公眾的餽贈），使大公司向大有利潤可圖的客戶提供堂皇的服務，刻意地對小客戶掉以冷眼，對他們的查詢和投訴不睜不睬，僅僅維持著寒微的服務水平。諸如這些經驗，人們是耳熟能詳，而且代價不菲——至於轉嫁到廣大民眾身上的代價有多麼大，則我們並不知道，因為那些帶有高度意識形態的經濟活動措施，是沒有把這方面計算在內的。

至於監禁，則可以視為另一種邊緣化的形態，是針對最無價值者而做。監禁並且有著另外的功能：這是介入勞動市場的一種形式，把適齡男性及愈來愈多的適齡女性撤出勞動市場。

社會邊緣化的多種形態

據一項資料豐富的學院研究顯示，假如把被監禁起來的勞動人口也計算在內，美國的失業率便會一反人們慣常聲稱的低水平，進而踏入到歐洲的高失業水平。這項研究的結論指出，問題乃在於美國作出了什麼選擇，而並非美國怎樣干預勞動市場：是選擇社會民主的模式，以提供職業訓練、失業保障之類，或是選擇把多餘的人投進監獄。

美國所奉行的政策把它自身與其他工業國劃分出來。在歐洲，早於數十年前，便已經放棄限制罪犯的投票權。在1999年的南非，憲法法庭賦予囚犯有投票的權利，指出「投票是每一個公民的尊嚴和人格的徽章」。美國在推行「新自由派改革」和「掃毒戰」這套相輔相承的政策之前，本來是朝往那個方向發展的。

克林頓——戈爾之推行解除他們本身的投票者的投票權的計劃，應該被理解為是他們的整體社會經濟觀念的一個理所當然的組成部份。而這一次選舉本身，是繪形繪聲地刻劃了同一個大公司所有主下的兩頭馬的政治制度的相應的觀念。自然囉，這裡面是毫無新意。美國沒有喪失了什麼的「黃金時代」，這也不是它對民主和人權第一次集中火力的進攻。在我來看，美國2000年11月大選倘若有什麼值得討論的方面，首先便應該從上述的角度來著眼。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月號）



米洛舍維奇下台後的塞爾維亞

——奧路積訪問記

馬龍、多納特

〔《社會主義展望》編者按：由「工人援助科索沃」組織最近邀請來英國的塞爾維亞活動家奧路積（Dragomir Olujic），接受了訪問。他是塞爾維亞新聞工作者工會的會員，曾積極參加了1968年學生群眾反對蘇聯入侵捷克，是鐵托治下南斯拉夫主要反對組織「自由大學」創建人之一。他被捕過20次，監禁了兩年。70年代後期，他主張建立獨立工會。1988年，他是「自我管理」（南斯拉夫第一張非官方的獨立報章）的締造者之一。

作為一位「南斯拉夫民主倡議」聯盟的首批成員，他參加了反對米洛舍維奇政權分裂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和戰爭的政策。近10年來，他活躍於許多反戰、反民族主義的塞爾維亞平民社團之中。〕

問：你能談談關於新的柯什圖尼察政府的情況嗎？

答：你可以用兩種方式來描繪塞爾維亞的現狀：一種是認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另一種則認為最壞的情況還未來到。為什麼？因為米洛舍維奇摧毀了前南斯拉夫，帶來一個災難的局面，他應該為25萬人之死、50萬個家庭被摧毀和產生3千2百萬難民而負責。在塞爾維亞本土，現在就有70萬難民。塞爾維亞的經濟只有15%的生產力在運行。失業率達到50%。

問：塞爾維亞難民怎樣生存呢？

答：難民在塞爾維亞是不允許工作的，他們只能非法地工作。他們也沒有任何權利。起初有許多來自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但現在沒有了。所以他們只能過著貧困的生活。如果他們有親屬，他們可以依靠親屬和得到他們的幫助，而許多人卻沒有。

因此，新政府現在面臨著巨大的任務，重建經濟使之恢復到原來的狀態，使塞爾維亞與世界融合交往，這是艱苦的工作。例如，需要60億美元來恢復經濟，而南斯拉夫卻沒有它，也無人會給我們。

當然，現在的塞爾維亞同過去既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新政府與它的政策同以前沒有什麼不相同。

它並不指責米洛舍維奇政府從前的政策，特別是它的民族主義。他們常說，他們比米洛舍維奇更具有民族主義。包括柯什圖尼察這個民族主義死硬右派在內，他們說將會更好地捍衛塞爾維亞的利益。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意識形態上的死硬更甚於米洛舍維奇。

依我看，只有塞爾維亞人民在改變，並非政治主張或政體在改變。例如，在米洛舍維奇時代，塞爾維亞有兩幅畫面，一幅是米洛舍維奇政府媒體所描繪，另一幅來源於獨立的媒體。而今天只有一幅，因為人們都稱贊新政府和柯什圖尼察。

一份調查資料顯示，從十月五日（柯什圖尼察上台執政）至十一月五日只有一篇關於對柯什圖尼察的評論，發表在所有的媒體（南斯拉夫有200家電台，5種日報，加上150種雜誌週報等）。

但在塞爾維亞有兩種重大的改變：其一，人民思想在開放，人民友好親切和有輿論自由；其二，這是明確的，工人階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

工人作為市民保衛新政府，但同時，他們又自發地佔領他們的工廠，試圖收回它們在自己手中管理。今天這種形勢仍在進行，但不如以前那麼強烈。

因此，柯什圖尼察政府有工人支持，但他們只作為市民來支持。工人投票選舉這個政府，但作為工人，他們有自己的要求。另一個問題，認為這種佔領和自己管理的行動只是獨立的聯合，也非關乎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

問：人們真的反對佔領嗎？

答：有些人反對：民族主義者和沙文主義聯盟反對。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的領導層反對，而一般成員卻支持。我想，那是工人權利問題和工人內心願望的表現。這是政府未來的主要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這次選舉中獲勝的聯盟是由18個黨派組成的，範圍包括從左派到右派。南斯拉夫的左派比較強大，特別是在青年人當中。年青人代表未來。

問：這就是他們要聯合周圍的人而不只是簡單撤除米洛舍維奇嗎？

答：他們聯合只是為反對米洛舍維奇，南斯拉夫人民投票只是為反對米洛舍維奇，而無其他意圖。

問：這種聯合能存在多久？

答：不長。現在在普通人民中有個問題，就是沒電。每天8點鐘，他們把電關掉長達8小時。而且，一些基本食品（如麵包、牛奶和肉類）的價格已上升200%至300%，而工資卻下降了50%。

人民把這些跟新政府聯結起來。這意味著有一種危險，將會給米洛舍維奇參加下次競選提供機會。特別是共和國的勢力強過中央聯邦的勢力，米洛舍維奇及他的黨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具有控制力，而別的共和國蒙特尼哥羅並不尊重聯邦政府。這將成為未來一個危險的問題。

問：米洛舍維奇怎樣才能回來？他不會被謀殺嗎？

答：如果新政府不能穩定局勢，那將增加米洛舍維奇返回的可能性。因為，對於南斯拉夫，沒有真正的選擇——只有米洛舍維奇或者另一位。

問：新政府已經控制軍隊、警察和特務機關了嗎？

答：關於警察、特務機關或軍事沒有任何改變，領導的頭頭仍是原來的人在指揮。

問：誰付給他們薪俸？政府？

答：無人確切知道——沒有人真的知道全部秘密。塞爾維亞有錢給軍隊、警察和特務機關等等，還有我們毫無所知的「其他的錢」。在國外，米洛舍維奇有錢存在塞浦路斯、希臘和瑞士。

問：我們能回到開頭去嗎？關於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你曾提到的有關米洛舍維奇摧毀了南斯拉夫的要點……新政府也有心願朝向一個更大的塞爾維亞目標嗎？

答：柯什圖尼察並不談論「大塞爾維亞」，但是他支持這種政策，而且在米洛舍維奇執政期間仍然支持。對於新政府，米洛舍維奇發動戰爭並不是個問題。問題是他並未獲勝。他們現在知道「大塞爾維亞」是不可能的。因此，無人支持和去談論它。

問：但這意味著他們將盡可能採取措施保證科索沃和蒙特尼哥羅留在聯邦而不獨立嗎？

答：同米洛舍維奇一樣，特別是與科索沃的關係，新政府的政策是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沒有任何權利。但他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會真正採取任何行動，因而他們保持緘默，只是說科索沃是南斯拉夫的一部份，那是聯合國確定了的。實際上，科索沃是受國際社會保護的。

問：如果大多數人民要求，你認為科索沃和蒙特尼哥羅會獨立嗎？

答：跟許多南斯拉夫的人民一樣，我想科索沃應該有自決權，聯盟的左傾黨派支持這個！而蒙特尼哥羅也支持這樣。但在蒙特尼哥羅，並沒有如此強烈的願望，如同在科索沃一樣。

對於我和南斯拉夫的工人運動，捍衛阿爾巴尼亞人的自決權是極其重要的，例如，在科索沃的特列普卡主要礦區，礦工們曾經三次舉行示威，向國際社會要求：第一，恢復他們的工作；第二，歸還他們的礦區。塞爾維亞的許多企業單位仍然使用從特列普卡來的產品。如果礦藏回到特列普卡礦工手中，它將幫助我們去鬥爭，收回我們的礦山和工廠。

我為什麼來到英國的原因之一，就是尋求支持這個鬥爭。

在南斯拉夫，仍然有許多人抱有私有化的幻想——在這方面他們沒有豐富知識和經驗，而我們需要這些，而這正是你們所擁有的。

工會的領導要求私有化，但普通的工人則不要。

同時，我們需要幫助來重建在塞爾維亞各工會、科索沃和前共和國各工會之間的種種連繫。九十年代初，我們有那些連繫，但是，北約的炸彈已經把它們摧毀了。建立這些連繫，我們花了五年時間。現在我們不想再用五年時間去把它們重建起來。藉著你們的幫助，我們能夠做得更快些。

（楊萍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0年12月號）



燃料短缺的抗議震撼歐洲

斯巴達聯盟

2000年9月17日，倫敦由於抗議者封鎖煉油廠和倉庫，在事件的幾天當中，迫使英國陷於全部停工的邊緣，並使數百萬人滿懷憤怒的感情發洩在貝理雅工黨上面。在這事件中關係重大地幫助貝理雅的是追隨工黨的職工大會的官僚。抗議的高潮恰逢職工大會的年會，它公開指責封鎖就像「劫持國家贖金的粗暴嘗試」。抗議者曾經給予政府60天的期限，來滿足較低燃料價格的要求，而這時候，油價又開始波動了，工黨的危機遠遠沒有結束。封鎖的效應將持續幾個星期，這段時間，憎恨針對著妄自尊大的貝理雅政府。

緊跟著英國的抗議和類似的封鎖的，是法國的卡車司機和農民的抗議，從爆發以來就遍及歐洲，並繼續從愛爾蘭擴散到法國和波蘭。這些行動，巨大地普遍表示反對貝理雅、法國的約斯潘和德國的施羅德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作為資本主義的政體，他們尋求通過對勞動人民生活的毀滅性進攻，粉碎福利計劃和折磨窮人來增加資本家的膨脹的利潤。過度的項目稅收，像汽油和柴油機燃料的稅率，最厲害地打擊了窮人和勞動人民。在「撕掉英國」的事件中，在歐洲的燃料價格比世界其餘地方都要高。無鉛汽油價格提高76%。公共運輸的費用如同天文數字，就像是開駛一輛轎車的費用。在一個工業社會裡，汽車不是奢侈品，而是大批工人上下班所必不可少的。

封鎖是由農民組織和公路運輸公司——小型和中型的資本主義公司，他們本身常是僱主——所發動和領導的，雖然領導這次暴動的力量大部份是小資產階級，發出得失攸關的口號——低廉的燃料價格——是明顯地為了勞動階級的利益，作為一個整體來說，這反映了人口當中壓倒多數的人支持這些抗議。

對於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動員，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是根據抗議的目標和事理的要求提出的：他們更進一步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嗎？在這個事例中，這些抗議明顯地是以貝理雅政府為目標，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這種要求的確是應予支持的。因為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處於兩個具有實力的——資本家和工人階

級——的集團之間，像農民和承運商會大幅度地在他們的方向中搖擺。有時候跟著工人積極地抗議，而有時候則成為法西斯份子吸收新成員的場地。

一個工人運動的革命領導，必須尋求掌握像這些抗議的領導權，以便指導他們，目標鮮明地反對真實的罪犯：資本主義和工黨政府。燃料危機是最尖銳的社會危機，自從1984-85年礦工大罷工以來，不列顛就已經經歷過了。這件事已經完全說明，不僅是工黨，而且特別是工會的官僚的腐朽本質。

一次運油司機的罷工，會把抗議變成一個強大的反對工黨政府的階級鬥爭。它能夠向鐵路和所有的運輸工人呼籲罷工，鐵路和私營的公共運輸系統同樣地憎恨這些官僚，正當石油封鎖運用積極的策略時，據聞溫和的農民也跟著說出「直接行動起來」這個流行的用語。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個政治綱領和領導權的問題。

據報導，被憤怒的抗議者在約克夏追趕的貝理雅，曾經召集石油老闆和警察的首腦到唐寧街，要求他們對抗議者採取強硬的態度，並在國家電視台宣佈：在24小時之內，油槽車要回到公路上。為了使貝理雅的自誇成為事實，加入工會的油槽車司機不得不把油槽車開出去。至此封鎖給打破了。工會的官僚對於「他們」反工人階級的工黨政府和資產階級表示奴性的忠誠，命令工會：鼓勵明智，不得越軌。最初，許多司機除了緊急供應所需汽油之外，都拒絕搬運汽油。但是運輸總工會的官僚們惡意中傷地指示他們的會員把油運出來。一份運輸總工會報紙9月12日發表消息，正如同一天，貝理雅的最後通牒說的：「工會代表運油司機強烈要求它的會員繼續工作，直至安全地做下去，」又說，「我們強烈要求抗議者撤離封鎖，允許我們的會員恢復交通運輸。」運輸總工會書記比爾·摩利士煽動警察說：「如果他們要破壞法律，抗議者將被逮捕」（《衛報》9月13日）。

根據《星期日電訊》（9月17日）的一個報導：「當貝理雅先生考慮派遣軍隊的時候，〔財政部長〕

布朗先生正在嘗試一個不同的計劃，利用工會來中斷爭論。」消息繼續說：「在格拉斯哥，在職工大會的前一天，他曾會晤比爾·摩利士，這個運輸工會的領袖，他的會員包括許多油槽汽車司機，他說服摩利士，需要終止這個危機。」〔副首相〕約翰·蒲萊斯考特警告貝理雅：派遣軍隊將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惡果，會拆毀「將要在那個晚上在工會領袖和油槽汽車司機之間的棘手的協商。」因此，工會的官僚對於工黨政府在平息這場危機當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與工黨決裂！

由石油抗議引起的危機、深度激發了政府的反應，在社會危機的時刻，這個反應，亮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運轉方式和兇惡的勢力排成陣勢，反對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者。警察在煉油廠出現，增加了力量，在艾色克斯已在準備利用軍隊；油槽車離開倉庫，有武裝的警察隨車監運。

在國會民主的虛飾後面，潛伏著大不列顛國家機器的真實性質。正如列寧所說：資本主義國家是由特殊的武裝的團體——警察和軍隊組成，這些武裝團體是用來保衛私人財產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夠改良，資產階級的權力必須被粉碎，並且由一個工人國家取而代之。為了打破石油封鎖，女皇主持的樞密院對政府授予了「異常的權力」，擔任了燃料分配的控制，包括使用軍隊的設備。這種女皇「私人的」議會，組成現時的和過去政府。我們主張：廢除君主政體！

農民和小運輸商人領導的這個抗議，公開地擁護民族沙文主義，正反映出他們的經濟利益。這個表白，是由一個卓越的在赤夏為農民的封鎖作發言人的希萊恩爾·威廉斯說的。他說：「我們不喜歡愛爾蘭人駕著他們廉價的柴油機來這裡，跟著工作兩三天，並把便宜的肉帶來，搶走我們的生計。」（《衛報》9月12日）。當抗議吞沒法國、英國和比利時，正渴望需要一個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時候，強烈反對反法國沙文主義的也是貝理雅號公司促使的。在1984-85年礦工大罷工期間，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曾出現過。當時工人從法國和其他國家為英國的同志募集過金錢，而且法國礦工和英國礦工一起唱國際歌，是國際階級團結的榜樣，這是必要的。我們要為動員工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為充份的移民公民權利而鬥

爭。

在英國和法國的國際工人聯盟組織對貝理雅工黨和約斯潘的社會黨領導的人民陣線沒有給予無論什麼樣的支持。

工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工人政黨。工黨政府從70年代破壞罷工、到陰謀敗壞英雄的礦工罷工，工黨和職工大會的上層，是勞動階級為統治而鬥爭中的重大障礙物。

改良主義左派在抗議的過程中顯示了他們對工黨的忠誠。共產黨的9月13日的《晨星報》反對抗議，並且強烈要求貝理雅：「政府有必要採取法律的步驟——在沒有使用警察暴力的情況下——保證石油和汽油的自由變動。」

工黨為英國帝國主義而統治

石油不只是另一種商品；它佔世界能源的40%多。對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使用石油具有這樣的、維持生命所必需的戰略重要性。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控制波斯灣油田，已經給予英、美帝國主義巨大的戰略利益，超過他們的對手德國和日本。在1991年海灣戰爭中，為了鞏固美國和英國所控制地區的石油供應，倫敦和華盛頓聯盟屠殺了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利用飢餓禁運的辦法，150萬人（包括50萬個兒童）已被殺害。帝國主義差不多每日利用批准轟炸襲擊繼續屠殺，阻止伊拉克石油到達世界市場。如果你想石油便宜，就要打破封鎖伊拉克，我們宣佈：打倒造成飢餓的制裁！

支持燃料封鎖帶來的震動影響和深度，使貝理雅政府面對一個較大的對抗。9月16日的《經濟時報》為城市（財政區）的發言人發表社論：「首相應該發現，1981年的檔案，當時瑪格麗特·戴卓爾夫人對礦工作出讓步是她沒有準備好；煤炭股票低沉。但是在1983年礦坑塌方以後，她準備好了，並且在一年之後，礦工被征服了。」斯巴達聯盟奮力擴展罷工到鐵路和船塢去，並且要封閉這個國家。但是，礦工們雖然富有戰鬥性地和英雄地反抗這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力，他們被背信棄義的工黨領袖和工會的官僚出賣了。當時礦工的領袖阿瑟·斯加吉爾（Arthur Scargill）仍然依靠著工黨。我們尋求把那次罷工的教訓逐漸灌輸到工人的覺悟中去，以便勞動階級能

夠向前走上勝利。

油槽汽車司機的行動差不多把這個國家僵住了，隨著油泵流乾了，超級市場的貨架空空如也，銀行現金沉滯不暢，鐵路經營者警告工人將無工可做。這種情況揭穿了一個「新經濟」的神話，根據這個「新經濟」，「全球」資本主義在實際的現實中運轉，是由於有了一隻幸運的老鼠起作用，使國家貨暢如流。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依靠無產階級的勞動和油槽汽車司機運輸燃料的。

勞動階級是唯一有權力、社會內聚力和打敗政府

進攻而有直接利益的實力。這個力量必須聯繫一個鬥爭去推翻全部的剝削階級的制度、民族壓迫、種族主義和戰爭——一個為工黨徹底堅持的制度。面對工廠的關閉、私有化和種族主義者的攻擊，大量的工人正在渴望從事於一些他們自己的富於戰鬥性的階級鬥爭。我們要求建立一個黨去領導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去剝奪資本主義階級，包括石油公司，並且建造一個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

（楊萍摘譯自2000年9月22日的《工人先鋒報》）

俄國的宗教與無神論運動

肖軍輯譯

自從1991年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俄國東正教會的活動驚人地活躍起來。眾多權威的民意調查表明，真正以教徒自居的人僅佔總人口5%，此外這些人中包括了大批伊斯蘭和佛教信徒。這樣算起來，東正教的群眾基礎只有幾個百分點，根本談不上什麼「全民族的精神避難所」。儘管如此，十年來教會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顯然與推動、鼓勵宗教（主要是正教）宣傳的國策直接有關。90年代初，在葉利欽總統一手安排下，革命後沒收的大量教會財物（主要是建築物、土地）歸還原主。與此同時，正教教會被授與一系列「創收」特權：教會屬下的商業公司從事的進出口業百分之百免稅。這類「創收」已使教會成為俄國當今最大的煙、酒進口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得到類似特權的還有一系列教育發展基金。由於國家稅收受到的衝擊，90年代中期除教會外，其它機構的類似活動已被中止。「上帝的僕人們」生意越作越大，除繼續買賣「萬寶路」「S.O.」酒之外，還從事規模宏大的宗教宣傳品（書報刊物，音像碟帶）的出版和發行；石油、天然氣、鑽石開採；銀行業。這一切自然也是免稅的。由於教會從不公開自己的財務收支狀況，很難準確估計神棍們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據網絡報紙「The

telegraph」的估計，每年教會作為一個巨大的免稅區洗錢的規模從數千萬到數億美元不等。

在沙俄時期，由於19世紀以來民主知識界的積極抗爭，一百年前已經在高等院校裡廢除了神學必修課。「民主化」以後的俄國一切都要推倒重來。一年前鐵道部長阿克修年科簽字批准了歷史性的文件：在鐵道部屬下所有教育單位（大學、專科技術學校）中恢復神學必修課。也就是說，從此神學不及格的學生在這些學校裡是不能畢業的。教育部長菲利浦夫在官方的《教育方法》雜誌上宣佈：「有必要在國家教育系統徹底清洗一切有背人倫的無神論宣傳。在這方面應與東正教會密切合作。」1998年由副教育部長科西廖夫主持編寫的大學歷史教材在「回歸人倫」的努力中一馬當先：這本書從頭至尾充滿了「君權神授」「天佑吾國」之類的昏話。

在這一片神權復興的烏煙瘴氣中，左派在忙些什麼呢？全國第一大黨——俄聯共是最積極支持東正教會的主要幾個政治團體之一。2000年秋舉辦的一次講習班上，該黨中央主席團（相當於過去的政治局）成員佐爾卡利采夫發言批評各級黨組織與東正教會合作得不夠緊密。「東正教是蘇聯人民唯一的精神支柱。在同帝國主義及其買辦資產階級走狗作鬥爭的時

期，沒有什麼比保衛這個主要的精神堡壘更重要的了。」他一本正經地解釋道。俄聯共杜馬議員之一阿斯特拉罕京娜數年前就準備了一個法律草案，以禁止任何無神論宣傳。「不能再眼睜睜地看著西方派來的特務毒害我們的青年了」。她憤憤不平地說。這個草案暫時沒有通過。但僅僅是暫時。

黨主席久加諾夫更與穿僧袍的打得火熱。1996年總統競選期間，這個左派候選人大聲疾呼：「……我認為國家應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支持教會……東正教是我國人民主要的道德勇氣源泉」。杜馬議長，俄聯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謝列茲涅夫特意告訴記者：「我定期去教堂祈禱……對此感到自豪」。另一個聯共領袖，原杜馬副議長甘梁切娃號召「所有的共產黨員……快快改悔，以贖回過去背離基督的過錯」。

較小的強硬派共產黨在宗教問題上同樣態度曖昧。共產主義工人黨機關報某編輯告訴筆者說：「我明白，報紙應該同宗教作鬥爭，特別是教會……怎麼說呢，大部份同志認為應該多團結，少爭論，我們需要大聯合……」。這家報紙5年來沒有登過一篇反神權的文章。另一個名聲在外的「極左派」領袖安比洛夫更乾脆要求「團結社會主義的東正教，打倒西方的、帝國主義中央情報局豢養的天主教和猶太教……蘇維埃東正教萬歲！」。小小的「革命共產黨」內部熱烈討論著關於「以東正教為精神食糧，開展反帝救國鬥爭」的必要性。該黨的白俄羅斯分部機關報操心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幫助東正教堂與天主教堂爭奪信徒。

零零落落的馬列主義小組對教會神權復興的勢頭要敏感得多。如果不是這些人的努力，列寧和托洛茨基真丟盡臉面。幾年來已存在著反神權和宣傳無神論的電腦網頁（「工人民主」），無政府主義者、托派和從共工黨分裂出來的左派定期舉行過街頭宣傳，比如說在基督救世大教堂修建時期，馬列主義小組舉行過不少次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對政府推行的強捐政策（每月從職工工資中扣除一定數目以用於修廟，並且強捐的對象不分國營私營企業）。2000年夏，無神論運動進入了一個較高的階段。首先是一批熱心青年成立了莫斯科無神論團體籌委會。這批人應該說是自由主義小知識份子。他們的目光開始也落在自由派身上，希圖獲得幫助。自然是一無所獲。人權活動家冷

地表示：「我們不搞左翼政治」，「無神論客觀上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個部份」。原來凡是碰觸資產階級國家根基的，就是左翼政治（一個插話：1998年圖拉州一家機械製造廠工人因長期拖欠工資——工廠正常運轉，就是不開支——找到杜馬著名的自由派人權活動家亞夫林斯基，後者不耐煩地表示：「我不搞政治！」「我關心的是人權問題」。工人恍然大悟：原來想吃飯就得搞政治！後來這些工人同一批馬列小組一起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這是另一個話題了）。去年秋天在托派（「工人民主」、「左翼先鋒隊」）和其它左派小組幫助下，成立了地區性無神論團體，定期出版「無神論傳單」，舉行街頭宣傳。到目前（2001年1月份）在十多個州建立了分部。

現代無神論運動的興衰起伏讓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復辟帶來的種種腐朽醜惡現象，只能在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導下才能真正受到有力的回擊。其它的潮流沒有作鬥爭的願望（自由主義者對人權廣泛受踐踏視而不見，民族主義者除了反美反帝的空談外，毫無振興民族工業的舉措）。因為什麼？害怕這種鬥爭會推翻資本主義！



托洛茨基

以托洛茨基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一章

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紀的地位

在二十世紀所有重要的社會主義者中，對這個時代的主要發展趨勢、主要矛盾認識最清楚的，是托洛茨基；對國際勞工運動的合適的解放戰略作出最清楚的、有系統的闡述的，也是托洛茨基。他對這個世紀的歷史的貢獻，絕大部份是以政治為出發點的，並且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張的，純粹在社會學方面的^{<1>}。它也明顯地有實際的作用，並不純粹是分析性——理論性的。他發展出一個在全球的規模上被分化了的階級鬥爭過程的觀念或模式，而且以此為基礎，得出了實際上、戰略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必要結論。

然而，這些概念是扎根在一個宏大的理論成就上的。這個理論成就即是不平衡暨綜合發展規律的發現。這個發展規律是與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所熟悉的不平衡發展規律十分不同的。^{<2>}托洛茨基的理論，徹底應用了辯證法來分析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它的衰落時期，而且以此分析為基礎，清楚揭示了使一個歷史機制運轉的各種主要因素（包括經濟、政治、階級、心理、意識形態和組織的因素）：

1. 在帝國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的進化圖式，即先進國家向較不發達國家展示它們自己的將來的形象，已經變為與它完全相反的東西。帝國主義阻礙了不發達國家的徹底現代化和工業化。^{<3>}

2. 這在帝國主義國家本身，導致一個矛盾的經濟動力。帝國主義國家只有在有空間擴張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的情況下，才能夠有機地增長。但是，隨著帝國主義控制了整個世界，帝國主義本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加強的這種不發達性，卻變成了一種阻礙，使它不能進一步增長。這將會日益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一旦停止了，為瓜分世界市場而起的爭執就勢所難免了。在這同時，整個制度的生產力，不是趨向於停滯，就是趨向於後退了。

3. 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這種倒轉、停滯的開始，再加上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尖銳化，都增加了這個制度進入一般性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紀是例外的情況，在二十世紀就變為常規了。這不但適用於不發達國家之內及帝國主義國家之內的社會、政治關係，而且適用於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二十世紀將會是戰爭和內戰、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紀。

4. 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將會加強社會中的後退運動，增加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進步收穫的威脅，而且日益導致‘古老的’前資本主義野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衰退所創造的‘新’形式野蠻主義的融合。巨大的災禍威脅著整個人類。^{<4>}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這種野蠻主義的一個例子。將會有其他例子，甚至比這更壞。

5. 近代靠工資為生的工人〔以下簡稱勞動者〕階級，是唯一能夠終止這一連串社會災禍的社會力量。這是它在經濟生活中佔關鍵性地位、它的社會、社會心理組成的一個後果。個別的勞動者們，由於他們相對於老闆們的隸屬地位和經濟過程中的物質弱勢，只有通過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人們合作、團結，並且使這種合作成為他們的社會實踐的推動力，才能夠保衛他們的眼前的、日常的利益，不是靠利己主義和競爭。^{<5>}但是，這正是重組整個社會、引導社會走出資本主義死巷、朝向唯一可能的正面出路即社會主義所絕對必要的那種誘因和推動力。

6. 因為這個制度在帝國主義國家及在第三世界，都日漸容易陷入危機，國家，特別是在危機嚴重的時期中，將會變成統治階級手中的一個強暴的鎮壓工具。不由工人階級推翻這個國家、奪取政權，這個階級就不會實現阻止向野蠻主義後退的歷史任務。^{<6>}

7. 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奪取國家權力的主要阻礙是，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領導層的、伴隨著工人階級本身在意識形態上的弱點的、日益增加的保守主義。^{<7>}（托洛茨基後來以描述勞工官僚層之演化為

一個有區別的、有其特殊利益的社會層份來向這個保守主義提供一個唯物論的解釋。)工業化國家的工人階級需要時間和鬥爭中的新經驗，才能夠克服這些意識形態弱點。

8.在某些較不發達的國家<8>，工人階級能夠比在較發達國家，達到較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團結和戰鬥精神。因此，可能的是（如果不是很可能的話），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會在西方工人們採取行動之前，奪取國家權力。

9.自我活動、自我組織是奪取、行使國家權力的天然工具。蘇維埃或工人會議是歷史本身在工業化以及較不發達國家所提出的無產階級政權形式。<9>托洛茨基在1906年坐了牢以後不久，寫了《蘇維埃歷史》。在此文中，他總結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任務如下：

以俄羅斯的城市為鬥爭的一個基地是太狹小了。蘇維埃試圖在全國規模上發動鬥爭，但是它主要地還是一個彼得堡的機構……毫無疑問的是，在下次革命暴動中，這樣的工人會議，將會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由全國大會所產生的全俄工人蘇維埃……將會在軍隊、農民、中等階級的平民部份的革命合作下……取得領導權……。

<10>

這正是1917年發生的情況。

10.然而，在較不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只佔人口的小部份。工人們如果不與勞動農民結盟，就不能夠贏得或保持國家權力。這些國家的革命的歷史任務，是資產階級或者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一樣，是在陳述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托洛茨基的立場中的新的東西，即他的不斷革命的戰略中的新的東西，是他的斷言：資產階級革命的這些歷史任務，只有通過建立與勞動農民結成聯盟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

<11>

11.工人階級只有通過自我活動、自我組織才能夠奪取國家權力。正是爲了這個理由，企圖向工人階級強加一個自我限制，要他們爲了歷史——理論的理由，將他們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實現民族民主的目標（資產階級革命的古典任務），是不現實的。一個在政治上得到勝利、自我活動、自覺、組織完善的工人階級決不會繼續讓它自己受老闆們的指揮和剝削。

<12>從非常實際的立場來講，一旦這個工人階級奪

取了國家權力，它將會開始處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個革命，將會沒有階段或中斷地，把實現民族——民主目標，與開始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結合起來。<13>

12.但是，正是這個使俄國工人階級可能比德國工人先奪取國家權力的不平衡暨綜合發展規律，卻使俄國工人不可能單獨、長期保持這個政權。（托洛茨基後來把這一點修改爲：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可能由工人們長期地直接行使國家權力。）

社會主義的建設依靠物質先決條件的存在。忽視這個物質先決條件，只會招致嚴重的失望（今天我們還要再加一句：引起嚴重的過火行爲）。托洛茨基在這一點上堅定地遵守馬克思的傳統，後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

這個‘異化’，用一個哲學家能夠了解的術語，只在兩個實際前提之下，才能被廢除。要變成一個‘不可容忍的’權力，那就是人們要用革命來反對的權力，它必須已經使許多許多人成爲‘無產者’，而且在這同時使這情況與現存的財富、文化世界矛盾。這個財富與文化，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加和高度發展爲先決條件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這已經意味著人在世界——歷史規模上、不是在地地方規模上的實際、經驗的存在），是一個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因爲，沒有它，需要會變得更爲普遍，而且隨著貧困，爭奪必需品的鬥爭以及所有舊的骯髒東西必定又會產生；而且更有甚者，因爲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商業才能建立。這些事情同時在一切國家產生了‘無產者’群眾的現象（普遍的競爭），使每一個國家依靠其他國家的革命，並且最後以世界——歷史、經驗地普遍的個人代替地方的個人。沒有這一點，（1）共產主義只能在一些地方存在；（2）相互作用的力量本身不能夠發展爲普遍的、因此是不可容忍的權力，但是會停留在土生土長、迷信的‘情況’之中；（3）相互作用的任何擴張會廢除地方的共產主義。單憑經驗來看，共產主義只有作爲佔主要地位的人們的‘立即’、同時的行動才有可能，這種行動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共產主義聯繫的世界性的相互作用爲先決條件的。此外，無產的工人群眾——與資本切斷了關係、或者連有限的滿足都

得不到的、因此不再只是暫時被剝奪了工作作為可靠的生活資源的大量勞動力——是以一個通過競爭而達到的世界市場為先決條件的。因此，正像共產主義及其活動一樣，無產階級也只能有世界——歷史的存在。個人的世界——歷史的存在的意思是，個人的存在是與世界歷史有直接、密切的關係的。〈14〉

今天，這段文字讀起來，就像對蘇聯和東方集團自從1950年代以來、如果不是自從193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的一個悲慘的預料。工人階級在較不發達的俄羅斯的勝利，只有靠革命成功地擴展到世界上至少幾個主要工業國家去，才能得以鞏固。這個革命，孤立在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中，是極容易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尤其是在經濟上，受到帝國主義世界市場的漸增的壓力所傷害的。〈15〉

13. 這決不意味著勝利的俄國革命面臨這樣的困境：要麼向資本主義投降，要麼在‘革命戰爭’中，以人工地‘輸出革命’來尋求解救辦法。〈16〉決不是這樣。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在根本上容易陷入世界性危機，現實的可供選擇的道路是：暫時將俄國革命的成就鞏固在中間階段（即後資本主義、但尚未達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支持俄國以外的共產黨，以利用更有利的條件。當工人們在若干個不同的國家為奪取國家權力而進行戰鬥的時候，這種條件是會存在的。這就需要這些政黨具有成熟、獨立的幹部和領導，以及在政治上成熟、能夠團結並且願意從事奪取政權的鬥爭的工人。這樣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不但會意味著徹底反對完全在單一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這種空想的企圖，而且會意味著徹底反對企圖用操縱、指令和冒險行動，使國際運動臣屬於這個‘被包圍的堡壘’的（被信為真的、短視的）國家利益和外交花招。這條可供選擇的道路，是以革命運動和每個國家的各個工人政黨的自主的成熟過程為先決條件。它在蘇聯也以推行一條逐漸加強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總重量的經濟政策為先決條件。

這條可供選擇的戰略，只不過意味著把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自我組織、自我解放的基本方針（一條與馬克思、盧森堡、《國家與革命》中的列寧所共有的方針），推廣到世界政治的全球的平面。

14. 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開啓的這個時代，改良主義漸進主義已經顯露為一個與企圖完全在一國建

設社會主義一樣的反動空想主義。〈17〉在一段連續發生嚴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時期，資產階級社會週期地被迫推翻先前建立的改革，利用更強制的統治形式，包括恐怖主義獨裁的統治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依靠自由派的支持，或者以中產階級社會的自由主義傳統為反對這個危險的一個方法，都是不現實的。只有一個團結的無產階級，通過集體的動員和集體的組織來進行強有力的干涉，才能夠對付這個威脅。制止這個議會外的群眾動員，惟恐它會得罪資本、把自由派和小資產階級推到反動陣營去，只會招致反動勢力的勝利。〈18〉因此，正像在較不發達的國家那樣，由工人階級來奪取國家權力這件事情，也將會週期性地在帝國主義國家提上議事日程。

15. 在我們這個世紀，為工人階級和群眾運動發展一條合適的戰略和策略，它的主要障礙是代替主義的理論和實施（實施來在理論之前），換句話說，作為社會變化、社會轉變的動源的獨立工人階級被某些其他機構所代替：黨、國家、政府、議會等等。這些代理機構都是工人階級解放的有用的、有時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比起真正的自我解放運動，它們必須一直是次要的。

每一次把這些工具當作目的的嘗試，到最後注定要失敗，但是在目前卻使工人階級解放的過程更為困難。這句話的含意是，我們必須反對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沒有一個民族會快樂的，如果它的意願被違背的話。如果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代替主義，意味著解放的過程所需要的時間，要比官僚們所製訂的程序長很多，那末，前者所造成的禍害當比後者少很多，特別是鑒於代替主義的實施在長期中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

16. 阻礙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超越他們已經達到的範圍，決不符合這個階級本身的利益，只符合它的保守領導層勞工官僚層的利益。在帝國主義國家，但也特別是在蘇聯，這個勞工官僚層已經成為一個自主的、有它自己利益的社會層份。它的利益是與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十分不同的。它並不構成一個新階級，也不能夠再生產它自己，但是，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期之中，它能夠保持、擴張它的權力和特權；換句話說，它能夠達到一定程度的歷史自主。最後分析起來，這種自主是工人階級相對被動、國際革命缺乏的一個結果。

17. 要突破這個歷史性僵局，由於在這個僵局

中，既非國際工人階級，又非國際資本，能夠從這個文明世界的危機中打出一條路來，光靠廣大的群眾鬥爭的再次出現是不夠的，雖然它的出現是必然的。奪取政治權力、建設社會主義，是只能自覺地去解決的任務。只有這些週期爆發的群眾鬥爭，配合著政治上成熟、久經考驗的工人階級戰鬥份子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存在，再加上廣大層份的工人的高度自覺，朝向社會主義的突破才會發生。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只有永不忽略主觀歷史因素，換句話說，只有拒絕接受機械論——進化論的宿命主義和原始的志願主義，才會成功。

托洛茨基充分地意識到處於這個社會政治僵局的根源的世界——歷史問題。他1921年在共產主義青年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發表的關於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的報告中，清楚地說出了這點：

因此，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坐落在同一土壤上，這個土壤使我們的勝利無可避免——當然不是在天文學的意義上像日落、日出那樣的無可避免，而是在歷史的意義上的無可避免，那就是說，除非我們獲得勝利，要不然，整個社會、整个人類文化的命運就注定了。歷史給了我們這個教訓。古羅馬文化就是這樣毀滅的。奴隸主階級到最後沒有能力領導社會向前發展。它被轉變為一個絕對寄生和腐爛的階級。沒有其他階級可以取代它，因此，古文化就毀滅了。……不被排除的可能性是，資產階級，在它的國家機構的支持下，以它自己的全部積累的經驗，也許可以繼續抗拒革命，直至耗盡了近代文明的每一滴活力，直至在今後的長時間內把近代文類推入崩潰、衰敗的狀態之中。根據以上一切，我只是要說，工人階級所面對的推翻資產階級的任務，並不是一個機械的任務。要實現這樣一個任務就需要：革命能量、政治智慧、經驗、廣闊的視野、決心、熱血但是在這同時冷靜的頭腦。〈19〉

我們在上面所總結的、托洛茨基對這個世紀的主要發展趨勢的全面評價，是在1903年至1923年之間所發展、1930-33年時期所完成的。他在這段時期也是一個政治實行家，企圖將他從這個一般世界觀點中所得出的政治結論付之實施：起初在1905年的俄國革命中，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人；在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人、十月革命的組織者；在1918-20年時期，他是紅軍的締造者，然後領

導它在內戰中獲得勝利；在1923-24年，他是反對蘇維埃官僚層、反對在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中代表這個官僚層的斯大林派的反對派發起人；在1930-33年時期，他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在1934-37年，他努力促進國際革命的新興起。因此，他在二十世紀歷史上的重要性，決不能夠被減低到只在1917年至1920年之間在俄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紀的大事件的實際進程光照下看待他的理論和實踐的成就，我們也應該指出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重大的判斷錯誤。在這些錯誤的判斷中，最重要的是他之繼續接受在帝國主義之下生產力不可能增長這個來自齊諾維也夫、年青的布哈林和盧森堡的成份多於來自列寧的成份的理論。雖然這個論點在1914-45年這段時期大致是正確的，它卻被戰後的長期繁榮確定地證明是不正確的。戰後的長期繁榮延長到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

托洛茨基的這個錯誤的判斷變得更引人注目，如果我們知道他在1921年預測一個十分不同的局面。他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關於世界經濟局勢的報告中，對於資本主義發生一次新的復甦的可能性，作了如下的描述：

這裡我們著手探討社會平衡的問題。……如果我們假定——讓我們暫時假定——工人階級不能起來進行革命鬥爭，只容許資產階級有機會長期支配世界的命運，例如二十或三十年，那末可以確定的是，某種新的平衡將會建立起來。歐洲將會狂暴地開倒車。數以百萬計的歐洲工人將會因失業和營養不良而死去。美國將會被迫在世界市場上改變它的方針，再度轉換它的工業，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歷削減。以後，在一次新的世界分工因而被在痛苦中建立了十五或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後，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向上擺動的時代也許會發生。〈20〉

1921年的25年之後，1948/49年的戰後繁榮時期開始了。托洛茨基的預測是超人地正確。

與這個錯誤判斷關係密切的，是第二個錯誤判斷。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的時期，在那時，托洛茨基相信，一次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試驗，將會在極短時間之內，決定蘇聯的、其實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命運。托洛茨基在（1939年9月的）《戰爭中的蘇聯》一文中寫道：

如果這次戰爭，如我們堅定相信的，激起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話，它必定在蘇聯導致官僚層被推翻、蘇維埃民主在一個比在1918年更高的經濟、文化基礎上的再生。在那個情況下，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否是一個‘階級’或是工人國家中的一個贅瘤的問題，將會自動地解決了。每一個人將會清楚地看出，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過程中，蘇維埃官僚層不過是一次插話似的復發。

可是，如果大家承認，目前的戰爭不會引起革命，只會引起無產階級的一次衰落，那末，留下來的是另一條道路：獨佔資本主義的更加腐朽、更加與國家融合以及民主被獨立政權所替代，不管這個民主尚在那裡遺留。……根據各種指標，這種政權將會是一個衰落的政權，標誌著文明的消逝。這個歷史性的抉擇，歸根究底，就是如下：要麼斯大林政權是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一次可惡的故態復萌，要麼斯大林政權是一個新剝削階級的第一階段。如果第二個預測證明是正確的話，那末，官僚層當然會變成一個新剝削階級。不管第二個遠景會是怎樣沉重的負擔，如果世界無產階級真正證明它自己不能夠實現事件發展的過程所給予它的任務，那末，除了只有承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國際矛盾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綱領會以一個空想而告終之外，沒有什麼其他的道路還遺留下了。〈21〉

這個估計是從以下的假設邏輯地推衍出來的：生產力的新增長將會是不可能的，因此阻擋了向社會主義成功地突破的先決條件。

六個月以後，托洛茨基在他的真正的政治遺言《第四國際會議的宣言》中，改正了他先前所作的關於時標的估計：

它不是一次暴動的問題。它是整個革命時代的問題。……需要為許多年的、如果不是幾十年的戰爭、暴動、短暫的休戰、新的戰爭和新的暴動作出準備。……速度和時間間隔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既改變不了一般歷史前景，又改變不了我們的政策的方向。結論是簡單的：需要以十倍的能量繼續進行教育、組織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工作。〈22〉

一旦這個在帝國主義之下生產力不可能增長的假設被看出來是錯的，那末，明顯的是，在我們的時代建立社會主義所需的物質、人力的先決條件就不在衰

退之中了；剛好相反，特別是人的生產力——工資勞動者的數目、他們的技術、文化水平——是正在快速地擴大。因此，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仍然是一個真正的可能性。

最後，托洛茨基直至1917年才把他的拒絕接受代替主義與他的清楚了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必要性綜合起來，以保證在那些重複出現的革命危機中所爆發的鬥爭，得到成功的結果。在1907年至1916年的這段時期，他為這樣的空想辯護：革命無產階級的集體壓力就足以迫使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不同派系採取共同的行動。這是1905年俄國革命中實際發生的事情。但是，至少從1916年開始，在德國、奧地利及俄國等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這個半自發、半調和主義的假設，很明顯地沒有現實的根據了。〈23〉

但是，即使把這些錯誤判斷考慮在內，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政治的成就，在這個世紀中，仍是無可比擬的。他將會以社會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戰略家載入史冊。而現在更會是如此，因為，當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被人清楚認識到的破產再度將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提上歷史的議事日程的時候，托洛茨基的遺產將會取得更大的重要性，成為有別於近代勞工運動中這兩個思潮〔即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有歷史意義、可供選擇的道路。

註釋：

<1> 例如Nicolas Krasso。

<2> 恩格斯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論提到了這個不平衡暨綜合發展規律，正像馬克思在其出名的1850年對共產主義同盟的演說中也提到了同樣的規律。可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相當不同的。

<3> 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是第三世界工業化/現代化的一個絕對的障礙物。這是1960年代替所謂依賴論（dependencia）辯護的人們的不正確觀點。半工業化國家已在第三世界興起。但是，它是不折不扣的半工業化，沒有更多點。德國、美國、日本能夠趕上、並且超過英國、法國、比利時的工業化水平。但是巴西、南韓、墨西哥卻不能夠趕上德國、美國、日本。

<4> 在1914年以前，羅莎·盧森堡和Jean Jaures都有同樣的直覺。這個直覺表達在他們的和平主義——反軍國主義的立場上。

<5> 列寧、盧森堡和Roland-Holst，特別是格拉比希和Karl Korsch，將這個分析系統化。

<6> 從恩格斯到盧森堡、托洛茨基和列寧等革命社會主義者們與像伯恩斯坦、後期的考茨基、希爾費丁及其他人那樣的漸進主義者們的基本分歧，在於對資產階級國家——以後被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對國家的這些基本上不同的態度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發展傾向的不同估計。伯恩斯坦等人假定資本主義內部的衝突的長期弱化，而恩格斯、盧森堡等革命社會主義者們則預測衝突的尖銳化和漸增地易於陷入危機。這個世紀的實際發展已經證明這兩個傾向中那一個是正確的。我們的世紀並不是如伯恩斯坦所認為的一個逐漸和平進展的世紀。它比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更是一個戰爭、危機、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紀。

<7> 托洛茨基在好幾篇文章中討論群體無產階級意識的守舊方面這個現象。一個好的例子是他的《俄國革命史》（1965年倫敦版）第一卷中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章。

<8> 不是在所有不發達國家，當然不是在最窮國家。

<9> 恩格斯認為，經過直接民主產生的公社/會議制度與人民在多黨制中對候選人有真正選擇的普選制是沒有矛盾的。後者是巴黎公社的制度。恩格斯認為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型。

<10> 引自伊薩克·多依徹的《武裝的先知》，牛津1964年，第149頁。

<11> 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是這個做法的歷史先例。他們正是爲了要完全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才不得不從資產階級領導層那裡奪取政治權力。

<12> 斯大林在1936年8月到1937年7月之間在西班牙、特別是在加泰羅尼亞向西班牙無產階級強加這樣一個自我限制、違背它的意願的企圖，就需要血腥的鎮壓。

<13> 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帕爾武斯——赫爾普漢德的不斷革命論不同的地方。對帕爾武斯而言，預想中的俄國‘工人政府’就應該完全停留在資產階級議會政制的範圍之內，像當時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那樣。

<14> 《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份，倫敦1970年，第56頁。

<15> 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中期對於世界市場對蘇聯經濟的壓力的預測，已經完全被1970年代以來的事件所證實。

<16> 布哈林、喬治·路卡克斯以及某些孟什維克和奧托·鮑爾都錯誤地責備托洛茨基持有這個觀點。

<17> 對托洛茨基而言，著重點當然是在‘完全’這個詞上。托洛茨基，終其一生，從來沒有懷疑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國家權力的國家立即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必

要性。

<18> 這就是堅持不懈的漸進主義者，特別是伯恩斯坦，在1848年的革命時，反對馬克思的立場所用的一個指控。

<19> 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的頭五年》，第一卷，紐約1972年，第299頁。

<20> 同上，第211頁。

<21> 托洛茨基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紐約1973年，第8至9頁。

<22> 《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紐約1969年，第218頁。

<23> 與二十世紀所有偉大社會主義者一樣，托洛茨基也對生態問題缺乏合適的了解。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小啟

本期因稿擠，《歧途與正道》長文未能繼續刊出，敬請讀者、作者鑒諒！

左翼群像（2）

樋口篤三

在朝鮮成長、在中國從事活動的安齋庫治（日共中央委員、候補幹部會成員，67年被開除）晚年反省到：「日共在戰前、戰後總是在鬥爭的最困難關頭把朝鮮同志們分派到最危險的地方。這樣做，即使自身沒有意識到，也反映了日共的民族排外主義與皇道思想。」（72頁）

保縣（因與日本人醫生結婚而改成日本姓）在戰爭時畢業於東京大學，在46年1月的日共五大上是三名朝鮮人中央候補委員之一。他在京成電鐵、京濱的東芝、讀賣新聞鬥爭等運動中出盡風頭，在49年時作為東北地方委員會議長指導佔領警察署以及東神奈川人民電車事件等極端戰術。他在日共六中全會的會議上自我批判時同時也承認「因為自己是朝鮮人始終受到歧視，因而發展成那樣的極端行動」，使整個會場肅靜無聲（74頁）。我與他共事三年，儘管他比我輩份高，也因為不滿他的權力慾而提意見批判過他。

後來讀到他的遺稿集，其中提到他與典代戀愛時，同時戀慕典代的日本人警察調查保縣的出身，在典代面前辱罵他：「朝鮮人也想靠近日本姑娘！」並毆打他。沒想到他受到如此歧視。這使人想到美國白人革命家拒絕與黑人同志握手的情形，這在日本也長期存在。出身沖繩的德田球一又是一例。

德田在故鄉名護市自80年代以來由市政府公報等追頌為「鄉土英雄」、「國際政治家」，由社會黨的戶口市長到保守派的比嘉市長、今天的岸本市長帶動，出資四百萬日元（加上各界捐款共兩千萬日元），花三年時間建成德田紀念碑。自民黨、公明黨、社會黨的市議員們都贊成此項提案，只有共產黨的市議員沒有表態，這是因為日共黨本部的宮本對德田的偏見所致。

70年「沖繩回歸運動」時的日共相關負責人牧瀨恆二曾對增山講過：「德田實際上不認為沖繩是大和（日本）。沖繩共產黨不應從屬於日本共產黨。那樣的話，沖繩人的自主性就喪失了」（250頁）。牧瀨還說：宮本堅持把（沖繩）人民黨組織解散、把沖繩的共產主義運動置於日共的中央集權之下，高安重正（戰後日共的沖繩政策負責人）可能是因為堅持德田的意見而被日共開除的（255頁）。

在日本革命運動史和日共黨史中，最「空白」（或者稱為歪曲）的部份是在朝鮮戰爭時日共的軍事鬥爭準備。

《日共五十年史》把朝鮮戰爭定義為「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稱日共的武裝鬥爭是「極左冒險」。《日共六十五年史》稱為「德田派極左冒險主義」，《日共七十年史》又稱為「德田野縣分裂派別的武

裝鬥爭路線的破產」。總之，這不是以宮本為正統的日共的行為，而是在中國、蘇聯指使下德田等分裂主義者們的自殺行為。

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在50年代，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第三共產國際）的絕對領袖，日共不可能違抗。實際上，宮本等在「恢復黨籍」時承認「我們必須開始武裝鬥爭的準備」（220頁），雖然他們可能沒有被安排到直接的這一類工作。但是，我們知道，早稻田大學的日共支部負責人由井誓在恢復黨籍後，作為懲罰，被派到東京最艱難的奧多摩的小河內工作隊，準備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山村政府。

50年秋天，九州地方委員會山本議長因為持有麻藥而被逮捕，被新聞大肆報導為日共地下武裝準備的證明。我們黨員一直聽信正統黨史，以為那是日本政府的謊言，但後來知道那是事實。

按照本書的材料，在山村建立武裝鬥爭據點是日共四次會議（51年2月）軍事方針「志田構想」的一部份，由被麥克阿瑟肅清出日本社會的黨員等兩千五百多人組成五十五個中核自衛隊與獨立遊擊隊（213頁）。據小松豐吉證實，他看到「從日本偷渡到中國的青年組成『日本人民軍』在沿海接受登陸作戰訓練」（215頁）。與此相關的是在與中國往返中活躍的「人民艦隊」組織者永山正昭以及為了「特殊財政」（搶劫資金）組成的「卡車部隊」隊長大村英之助。大村曾是日共的文化部長，頗有文才，是植村申午郎（經團連會長）親戚。但他被任命為「卡車部隊」隊長，成為日共武裝鬥爭失敗的替罪羊，被日共在六次會議上以「貪污無恥」罪趕出日共並因此被投入監獄。我們長年以來都認為那傢伙臭名昭著、罪有應得。而實際上，「特殊財政」的部份資金被志田重男貪污，在東京的神樂縣高級餐廳揮霍浪費。此事被佐和慶太郎揭露後（235頁），宮本只好開除了他的這個親信。

誰也不知道因「貪污無恥」罪入獄的政治犯大村的命運。還有小松豐吉，姐牙仁郎等成為「廢物」在新宿開小麵館為生的人，他們曾經忠實地執行黨中央的政策迫害他人，最後又被黨開除，無法回歸社會，他們的心靈會安寧嗎？與那些被敬貢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之墓」、被合祀在「日本共產黨常任活動家之墓」（東京都八王子市上川靈園）的幸運左翼人士相比，誰去悼念那成千上萬的為日本革命事業奮鬥犧牲、經歷悲壯人生的「無名戰士們」呢？

（趙京摘譯自《橋樑》週刊2000年10月23日——12月4日號）

(來論)

重慶地區托派發動的 一次轟動大西南的反特鬥爭 ——胡世和烈士殉職五十二週年祭 趙芳舉

一、一封檢舉信

1945年舊曆的正月初六，這天是春節後重慶電力公司職工開始上班的第一天。業務科長張玠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封信，張科長拆開一看，原來是檢舉蒼坪大街「中韓文化協會餐廳」私自搭線避表偷電的舉報信。一時營業廳和工人候工室裏議論得沸沸揚揚。大家都知道「中韓文化協會」，實際是利用官方這個名字，而餐廳是國民黨大特務吳漢治、田凱、江德懋和重慶市警察局長唐毅等共同開辦經營的。吳漢治是餐廳的總經理，田凱（又名田士興）是外交經理兼無錫飯店總經理，也是警察局長唐毅的拜把兄弟；江德懋也是該餐廳的外交經理兼小龍坎電影院的總經理。在他們的頭腦裏不存在「偷電是違法」這個概念，正如他們說的：「什麼偷電不偷電，你電力公司算老幾？」

問題已擺在面前，偷電照章必須取締，但誰敢去執行？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任務。營業科下屬有「抄表」、「票據」、「收費」和「用戶」四個股，用戶股專管裝表供電、拆表停電和接戶線的檢查維修。當然，發現偷電自亦立即剪線取締。

用戶股包括內、外勤共配有工人四十多名，外勤工人編制為七個小組，每組五人，其中領班技工一人，幫工一人，小工三人。這天早晨為派工取締中韓餐廳偷電，已先後派過三個小組，但都一再推諉拒絕前往。稍後，小組領班技工劉振基一步踏進候工室，用戶股長章疇敘把他叫到了營業廳，說：「中韓餐廳偷電，你帶小組去剪線取締，怎麼樣？」「什麼『怎麼樣』，我們去就是。不就是幾個特務開的那家館子嘛！」章股長的臉上立即呈現極為贊賞的神情，並加派了技術員羅鴻燦共同前往。劉振基只帶了小工胡世

和、朱雲成兩人，叫他們扛上梯子拿上工具，他自己只拿了一把鉗子，逕往中韓餐廳。

二、復仇的火焰

新年剛過，一大早中韓餐廳食客很少，空蕩蕩的。特務的耳目靈通，他們已經得到要來剪線的消息。樓上大廳的樓口站好了十多個穿白衣的青年特務服務員，大特務江德懋站在前頭，走前一步攔住了走在前頭的劉振基。幾句對話餘音未落，劉振基側轉縱身登上了梯子，鉗子尚未接近電線，即被特務一把拉了下來，把他們團團圍住。在小特務們抓住劉振基雙手的同時，江德懋舉手狠狠向振基左臉打去。技術員和兩個小工邊喊邊上前阻攔，但屈於寡不抵眾，被特務們連打帶推，一起趕下樓來。剪線不成，劉振基他們回到了公司。

公司營業大廳裏擠滿了職工，發出一片咆哮聲。劉振基左臉頰一片青腫，嘴角掛著血絲，講述著事情的經過。業務科長張玠（民主士紳張瀾的侄子），用戶股長章疇敘（進步作家章靳以的胞弟），他們也極感震怒。他們已不只是為了維護公司的利益，而是為特務的橫行被激起憤怒！張玠一拳打在辦公桌上，高喊著「無法無天！」章疇敘從腰間掏出一支自衛手槍甩在桌子上：「跟他們幹到底！」自然，章股長也不是想用這支手槍去和特務拼命，而是表示支持工人鬥爭的決心，一定把取締偷電和特務鬥爭到底！幾年的相處，我早已知道章疇敘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基層領導；張玠也是一個公正倔強的人。

「惡人先告狀」，這時，傳達室的工人王炳雲得到消息，毆打劉振基的大特務江德懋已去官井巷派出所搶先報案。聚集在營業廳的職工頓時燃起了復仇的火焰。盛怒之下一哄而起，在毫無組織和準備的情況

下，十多人追向官井巷攔截江德懋爲振基復仇！劉振基是我們托派的同志，不管怎樣，都必須向大特務江德懋討還這筆打人債。我約同事楊世明（我們都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的同學，也都是轉業到此的要好同事，此人正義感很強）急速跑在最前頭，趕到官井巷口時正與江德懋相遇。我倆一前一後將他牢牢抓住，江想伸手去掏腰藏的手槍，已被世明將其雙手反背扭住。我左手抓住他的衣領，右手狠狠掌擊他的臉頰，小腹受不住我膝頭的衝擊腰已彎下。世明騰出右手正要去繳他的手槍時，派出所已有十幾名警察跑步趕來，將我和楊世明抓住。公司的十幾名職工匆匆趕來，已無能爲力。我倆當即被押往派出所關在候審室裏。儘管在警察眼裏把我倆看作是「打人兇手」，但我們心裏卻感到無比舒坦，也算平熄了心頭復仇的火焰。遺憾的是未能繳獲特務腰藏的手槍。

當天下午，電力公司經理室秘書（名字記不起了）、業務科長張玠、用戶股長章疇敘、職工劉振基、羅鴻燦、徐昌裔等和中韓餐廳來人吳漢治、江德懋，另有派出所長（名字記不起了）等一起在派出所進行談判。劉振基敘述剪線經過，話音未落，江德懋一手指著自己臉上貼著的大塊紗布，一手指著徐昌裔大聲吼：「就是你打我，就是你！」一手又指指肚子：「把我打成內傷！」徐昌裔膽小怕事：「你看清楚是我嗎？是趙芳舉，你去看，就在候審室裏！」接著又補上一句：「不要冤枉好人！」也難怪，徐昌裔和我都是穿的米色粗呢大衣，身高都是一米七。

經過一番反復爭論，雙方勉強達成協議：一、雙方互有毆打，各有輕傷，不再追究；二、竊電照三個月按用電量計算補清電費；三、保證今後不再竊電；四、電力公司有權隨時進入餐廳查看線路；五、趙芳舉、楊世明立即釋放。

劉振基堅持自己的意見：「中韩餐廳偷電打人，必須拆回電表永不供電」。中韩餐廳吳漢治、江德懋堅決反對，公司來人對此未表態。談判到此不了了之。

三、胡世和壯烈犧牲

這天下午工人沒有派出工作，大部分在候工室裏議論紛紛，情緒激憤，認爲對中韩餐廳不能就此罷休。至於如何幹法，沒有具體的統一意見。劉振基已向托派組織（重慶地區）上級作了匯報，我想，必有

明確指示。當天晚上我們電力公司的托派成員開了一個碰頭會，大家認爲和中韓餐廳這場已經挑起的鬥爭，不能停止在「偷電打人」，一定要藉此事件引向反特政治鬥爭。條件已經成熟，一旦事態擴大，全市工人一定會支持我們。《新民報》、《新蜀報》、《益世報》、《新華日報》等社會輿論也一定支持我們。電力公司爲自己的經濟利益，如張玠、章疇敘等已經在支持我們的行動。並在碰頭會上一再強調絕對不能暴露我們的政治身份，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場鬥爭是托派組織發動和領導的，這是組織紀律！最後決定，次日早在候工室工人群眾當中展開鼓動宣傳，和偷電打人、橫行社會的特務鬥爭到底，拆回電表永不供電。不把中韩餐廳鬥垮，今後就不能保障我們電力工人外出工作的人身安全。這就是我們托派對形勢的估計和行動綱領。

在這裏有必要先將重慶電力公司的托派情況談一談：1940年11月底以前，在工人當中只有劉振基一人，1940年11月30起，我進入電力公司，在職員當中也只我一人。1943年春，我通過用戶股長章疇敘介紹黎昌堃進公司用戶股爲學工。記得是安排在劉振基小組工作。振基對他進行托派影響，他在思想上逐漸靠攏托派，成爲托派成員。黎昌堃後又被調校表室工作，黎對校表室技術員任培江進行托派思想影響，使任培江解放後被打成「半個托派」而受到嚴格審查並「永不重用」（三中全會之後已提升爲電業局總工程師）。

劉有綬進入電力公司之後，一段時間是劉振基小組的幫工（技術工），受劉振基影響成爲托派中堅成員。劉有綬做事極有魄力，能力很強。解放後全公司（包括三個發電廠）工人都知道他是進步工人，由先進被選爲電業工會主席，曾代表西南電業工人出席了北京全國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後以執行李立三的「錯誤工會路線」——「工會監督黨」和公司軍代室「頂牛」而被撤職。

胡世和、朱雲成都曾經是劉振基小組的工人（普工），思想上都傾向於托派，有一定的思想覺悟。有事吩咐，他倆總是：「我們聽劉師傅的，沒錯」。

用戶股職員蕭一可，彼此在生活上長期相處，我對他影響較深，思想傾向托派。在政治上許多問題我倆的看法是一致的。胡世和被特務槍殺後的《告全市人民書》就是蕭一可執筆的。

中韓餐廳「偷電打人」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舊歷的正月初七，電力工人候工室裏坐滿了工人，時針指著上午八點，但大家似乎都沒有外出工作的準備，派工員也沒有派工的打算。我們照昨晚商定的計劃，在工人們情緒依然極度高漲的情況下，插在工人中間有目標地作了一陣面對面的鼓動宣傳，指明：「正義是在我們這邊，我們決不是孤立的。假如一旦事態擴大，社會各行業是支持我們的。特別是公司三個發電廠和各大工廠工人弟兄以及供水、水運、公交、碼頭等工人都會支持我們。中韓餐廳特務毆打執行任務的劉振基，是對全體電力工人的最大污辱！」劉振基表態一如昨天，願帶頭前往中韓餐廳剪線拆表停止供電。劉有綬、黎昌堃、胡世和、朱雲成等首先表示共同前往。繼之劉振基的湖北同鄉領班技工吳興芳、劉瑞根鄭重聲言各率小組工人一同前往。賡即異口同聲全體響應。他們都在準備帶上自己的「武器」：扳鉗、手錘、扁鐵之類的工作器具。這時營業廳的職員也聞風而動。趙芳舉、楊世明、蕭一可、毛日章、徐昌裔和羅鴻燦以及派工員陳尊雲等，已有八、九人等待工人一起出動。用戶股長章疇敘揮動雙手表示熱情支持。這是第二次剪線拆表，又將出現什麼局面，誰也無法預料。

中韓餐廳大門前早已站了一排身穿白衣的特務，足有二十多人。大特務吳漢治站在一排特務的後邊樓梯口，雙手插腰，顯然是決定要和電力公司的工人打鬥一場了。電力職工在靠近中韓一邊的馬路上站成一片，劉振基小組的幫工楊XX（名子記不起）矮個小伙子，首先攀上電桿剪斷了中韓餐廳的電線，其他工人正要向樓上衝去，在吳漢治的指揮下，白衣特務一擁而上，同電力職工撕打成一片，頓時成了戰場。我在注意打鬥的瞬間，冷不防被樓上扔下的凳子砸中了右肩，禮帽被打落，急速退到馬路中間。我看得很清楚，中韓餐廳隔壁無錫飯店門口突然出現一個身穿米色服裝的人，對我們的工人又推又打，舉手猛擊胡世和一拳，胡即舉起手中的扳鉗向這人頭上擊去，手未收回即被此人向其腹部開了一槍。胡世和再次舉起扳鉗時手已鬆開，扳鉗落地，兩手捂著下腹站不住了。開槍的人就是山城紅極一時的大特務無錫飯店總經理兼任中韓餐廳外交經理田凱又名田士興。田凱開槍後乘機逃逸。

大特務田凱槍殺胡世和的槍聲一響，與中韓餐廳

相距五十公尺的評書場（即今五一電影院）裏急速跑出約四十名警察（大部分是總局的警官），將現場團團圍住。他們讓二十多名白衣特務「服務員」（也包括吳漢治），全由後門逃走，而將電力公司工人作為「聚眾鬧事」全部抓捕。胡世和臉色慘白，腰身彎著站立不穩，由兩個警察架著胡的兩臂，連拖帶拉一路流著鮮血一起拖進了相距一百公尺遠的保安路警察總局（即今八一路軍區招待所）。胡世和剛剛被拖到總局大樓前的坪壩即停止了呼吸。大家一擁圍攏過來，瞬時響起了一陣憤怒的吼聲，淹沒了警察局長唐毅的「訓話」。唐毅提高嗓門講的最後一句話是：「聚眾鬧事擾亂治安於法不容！暫時放回聽候處理。把死了的人抬走！」工人們又是一陣怒吼。事情當然不會就此了結，憤怒的火焰必將在山城燃燒起來！

胡世和是電力工人的階級弟兄，也是我們重慶托派的革命朋友，他的犧牲為我們帶來了悲痛，也為我們帶來了自豪。他沒有死，五十二年匆匆過去，但他一直活在我們的心中。一想到他，心情總是沉甸甸的！

在一片怒吼聲中，工人弟兄將胡世和的遺體抬到了中韓餐廳的大廳，在大廳一端鑲攏兩張餐桌將遺體安放在上面。買來香燭紙錢點上油燈，由工人輪班守護。這時是舊歷的正月初七上午九點四十五分。

四、砸爛餐廳餘怒未消

胡世和被特務槍殺，事態驟然擴大。公司托派同志分別交換意見之後，急速通過電話分向三個發電廠與工人聯繫。繼之劉振基親自前往大溪溝發電廠，黎昌堃前往彈子石發電廠，分頭發動工人與特務鬥爭。劉有綬是否去了鵝公岩發電廠（地點較遠），我不敢肯定。消息一到，工人嘩然，自發情緒特別高漲，群起立即行動。三個發電廠共出動七部卡車滿載二百餘人，駛向城內「精神堡壘」（即今解放碑）蒼坪大街。鋼錘、火鉤、鐵棒、人手一根，瞬時中韓餐廳已被四面包圍，而餐廳大小特務早已逃匿無蹤。一部分工人衝上樓去，但見胡世和長眠桌上，悲痛與怒火陡然爆發，高呼「砸爛特務窩子」。所有餐桌、椅凳、廚櫃、鍋碗、家具和門窗等，瞬間盡成碎片。除胡世和遺體停放之大廳一端安然未動之外，一半以上的木地板已被撬爛。廚房存放之兩百斤豬油木桶已被倒入炭灰、大糞加以攪拌。工人階級對特務的一貫憤恨，

一起發洩出來。他們集結於蒼坪大街達兩小時之久，直到電力公司經理室傳話之後，滿載工人的七部卡車，他們高喊著「砸爛中韓餐廳！」「消滅特務！」的口號繞「精神堡壘」一周憤憤而去。這時是初七下午一點三十分。

五、《告全市人民書》和重慶托派組織散發的反特傳單

正月初七的下午兩點，大家都沒有上班，用戶股長章疇敘叫來本股文書員蕭一可，讓他為胡世和被槍殺事件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書，呼籲全市人民支持我們的要求：立即槍斃偷電殺人的特務田凱。並告訴我協助蕭一可寫好這份書告。書告是以公司主管的示意而以工人的名義向全市廠礦機關單位發送，當然是公開性質。經我倆商定：「為特務田凱槍殺電力工人胡世和告全市人民書」為標題，內容詳述了胡世和為執行取締中韓餐廳偷電任務而被外交經理大特務田凱槍殺的經過，並斥責了重慶警察總局出動大批警察，蓄意抓捕電力工人，掩護、放走殺人兇手及所有打人特務的幫兇行為。書告提出了立即槍斃殺人兇手田凱的要求。內容文辭強硬，事實確鑿，矛頭明顯指向民憤極大的國民黨特務組織。

下午五點半，《新民報》社的負責人陳銘德，由章疇敘陪同來到用戶股，來意是要看一看這份書告的起草內容。看後，陳先生認為：「不宜過分強調『特務』的問題，而主要是中韓餐廳偷電和它的外交經理田凱槍殺執行取締任務的工人，特別是標題更不宜冠用『特務』字樣」。當然，我們理解陳先生所處的地位，況且陳先生已首先當面表示堅決支持電力工人的正義行動。我和蕭一可同他短暫地爭議之後，作了如下決定：書告的標題改作《為電力工人胡世和被田凱槍殺事件告全市人民書》（只記得大意如此），但在內容上，我們還是堅持田凱、吳漢治和江德懋等一伙的特務身份。陳先生勉強同意。

這份呼籲書，我們托派認為是很不夠的。我們認為國民黨蔣介石龐大的特務組織是他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把鬥爭的矛頭引向一場反特政治鬥爭，當前是最好的時機，必須把中韓餐廳違法偷電、特務開槍殺人與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一貫殘害人民聯繫起來。當然，這份半官方的公開呼籲書也有它一定的積極意義。重慶托派組織為了進一步推動這一反

特政治鬥爭，不失時機地散發了大量反特傳單。根據幸存者至今健在並親臨現場散發這一傳單的當年重慶托派成員劉志超回憶：《傳單》，約略記得是重慶托派領導人之一隗寬執筆擬稿和范文華的協助繕印的。具體內容文字已回憶不清，只記得內容措辭強硬，並號召全市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和國民黨特務鬥爭到底。

六、蒼坪大街成了輓聯世界

正月初八早晨九點鐘，一條蒼坪大街早已集滿了市民群眾。電力公司文書股同仁給胡世和烈士送來一副輓聯，準備掛在中韓餐廳靈堂遺像的兩邊，表示對胡世和烈士的哀悼。輓聯寫著：

但求任務完成，哥子盡可從容去；

不得公平解決，我等還得繼續來！

有人建議輓聯應該掛在餐廳的外牆上，也好讓市民群眾看看。遂即將輓聯高高懸掛在二樓餐廳的外牆上，群眾一擁而來，互相推敲著輓聯的含義。稍後，電力公司各科股的同仁，都陸續送來了措辭不同的輓聯。外面的單位、商店和各行業職工都陸陸續續送來了各式各樣盡皆措辭激憤的輓聯。現將至今尚能記得的幾副輓聯寫在這裏：

（一）說什麼「勸鬥毆鳴槍示警」；（引唐毅語）

無非是大特務偷電殺人！

（二）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

（三）盡忠職守，臨危無懼，世和烈士芳百世；

殘害人民，至死不改，田凱特務臭萬年！

正月初九上午十一時，《新華日報》專人送來未具名輓聯一副（所有輓聯一般均未具名），用蒼勁的毛筆字寫著：

特務橫行何處去？

自由光明幾時來？

這副輓聯掛在了餐廳大門的左上邊。

就在初八至初十的三天之內，中韓餐廳四十餘米長的二樓外牆上，全被輓聯所覆蓋。參觀拜讀者之多，大街為之擁擠不通，車輛繞道而行。「友邦」人士包括各大使館、美軍、外僑和中外記者等等，前來參觀攝影者終日絡繹不絕。「胡世和事件」一時轟動大西南並傳出國外。先後專為前來蒼坪大街瞻仰者不下二十萬人。

從正月初八起，重慶各報除《掃蕩報》、《中央

日報》之外，都在頭版大篇幅連續報道中韓餐廳偷電，外交經理田凱槍殺電力工人的「胡世和事件」，主張嚴懲殺人的兇手田凱，以告慰死者英靈和平息山城人民的義憤！各報特別是《新華日報》，天天都有被檢抽的報道而開成無字「天窗」。從初八起，我開始剪輯各報對「胡世和事件」的報道文字，至正月十五日止，共剪輯報道（包括社論、專題論述和短評等）大小二百餘篇，訂成了厚厚的一本真實的歷史記述。爲了妥爲保存，暫時鎖在辦公桌的抽屜裏，至第二天早晨上班時，只見抽屜被撬，剪報集冊不見了。這偷盜不是別人，正是公司工會理事、國民黨市黨部特務楊秀臻（解放後已被處決）。楊在頭天下午我在最後裝訂剪報冊時，他剛好碰見，並翻閱瀏覽一遍，說：「以後借來看看」，但以後多次在辦公室見面，再也不提剪報的事。又據辦公室工人李詩反映：頭天晚上楊秀臻曾到辦公室來過一趟，在我的辦公桌邊坐過一陣。到此，一番心血付之東流！也好，這本剪報集冊若不是被人偷走，解放後就如同我的十二本《列寧選集》和《共產黨宣言》一樣，必然成爲我的又一「罪證」！

七、賀耀祖召集緊急會議和他的黃山之行

正月初十上午九點，重慶市長賀耀祖在電力公司大飯廳，召集重慶市各主要廠礦、公司單位工會代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到會代表的單位有：電力、供水、公交、水運、碼頭和採石建築等共計工人代表四十多人。劉振基和我都不是工會領導成員，而是作爲「胡世和事件」的當事人而出席這個會議的。賀耀祖知道這幾天重慶工人正在醞釀罷工，要求槍斃殺人兇手田凱，因而情緒表現有些激動而又顯得無可奈何。開口就說：「召集這個會議，就是聽聽大家的意見」，並說：「田凱槍殺工人胡世和，罪不容恕，必將受到國法的嚴懲！」話音未落，大家一哄而爭相發言。劉振基講述了兩次取締偷電被毒打和大特務田凱槍殺胡世和的經過，頓時全場怒吼，一致要求立即槍斃田凱這個罪大惡極的特務。並指控：「田凱殺人至今三天已過，依然逍遙法外；唐毅局長包庇兇手放走田凱，也必須受到懲處！」工人聲言，兩天之內不槍斃田凱，當即發動全市罷工。賀市長突然站起來，伸出雙手向下掘動著，要求大家盡量忍耐一些。接著又說，他作爲一個市長，沒有說殺就殺的權力，還得請

示有關上級和經過法律程序。最後，市長保證兩天之內定有答覆。會議到此爲止。

據靈通人士消息：不知是市長的主動還是上級的召見，賀耀祖於正月十一日大早去了黃山。他在黃山官邸向蔣介石作了匯報。其實，老蔣早已清楚知道。聽完匯報只說了八個字：「影響極壞，處決田凱！」「稟報委座，據唐毅局長匯報，田凱已畏罪逃跑」。「跑了？！娘稀比，拿唐毅抵罪！」賀市長匆匆下山回城，首先召見唐毅，唐毅一聽，嚇得兩腿一軟跌坐在沙法上。連說：「田凱已被抓獲，現羈押在黃桷埡專人看管」。（其實，田凱是經唐毅包庇有意藏匿的）。賀耀祖一聽，心頭鬆了一口氣：「那就好，聽候處理」。

正月十二日上午，重慶市政府派人送來一副未署名的輓聯，說是市長喊寫的。輓聯寫著：

忠於職守胡世和死無遺怨；

蔑視國法田士興殺有餘辜！

輓聯貼在了中韓餐廳大門的兩邊，似乎顯得特別重要。群眾翹首駐足爭看，議論紛紛。這副輓聯足以說明，田凱的末日即將來臨。

八、蔣介石被迫忍痛處決田凱——田士興

田凱槍殺胡世和之後，國民黨不少高級官員包括特務組織，都爲包庇田凱上竄下跳、說情買好。田凱是軍統特務，市警察總局唐毅局長的拜把兄弟，重慶的各行各業都有他的勢力。人們誰不知道，就是侍從室也得讓他三分。這些情況，蔣介石並非不知，但迫於重慶廣大工人階級的強大壓力，不得不忍痛處決田凱以平民憤。

正月十三日上午九點，從太平門老巴縣衙門看守所押出了殺人兇手大特務田凱，法官問他還有什麼話說，儘可以說。他直擺腦袋：「我田凱竟會這個下場！後悔呀，還有什麼說的！」法警拿過「處決殺人犯田凱」的標牌插在田凱的背上，押上了刑車。九點半，專人通知他老婆收屍。一個中年婦女抱著一條紅毯，跑到蒼坪大街中韓餐廳門前（傳說是在中韓餐廳門前就地處決），這才有人告訴她是在菜元壩河邊槍斃的。

這天中午飯後一點鐘，我和蕭一可（我們托派的好朋友），漫步繞到了臨江路西來寺街，看見田凱安靜地睡在路邊他自己的大門前一塊竹涼板上，還是穿

著他那一身米色的毛呢服裝，臉朝天沒有覆蓋。光腦袋的頭頂右後處，有一個不到一公分直徑的小洞，沒有血跡。據說，這是執法行刑的兄弟伙看在「田大爺」的份上，特別破例用小手槍處決的。保住了腦袋沒有開花。

我們在參觀這個「殺有餘辜」大特務屍首的同時，有一個田凱的鄰居老年婦女站在田凱屍首旁，指指點點控訴著他：舊歷除夕的年夜裏，她餵的豬仔叫了幾聲，田凱說吵了他打牌，跑來她家把豬仔給槍斃了。她又說：「大年初一，田凱在百老匯吃茶，把茶碗拂落地下打碎了，這是不吉之兆，合該槍斃！」

九、長安寺追悼大會，胡世和駕返岳池

大特務田凱被處決，這是抗戰陪都重慶工人階級在托派的發動和領導之下，同國民黨特務鬥爭的最終勝利。正月十三日下午兩點半，電力公司工人和胡世和的愛人胡大嫂以及他們唯一的嬰兒，一同將胡世和的遺體由中韓餐廳移往廣闊雄偉的古刹長安寺，舉行了莊嚴、肅穆的追悼大會。會後三天讓市民自由前往吊唁。靈前擺放的花圈、花籃、鮮花、果品琳琅滿目。自正月十三日下午至十六日中午，三天之內，日夜前來吊唁的市民群眾，多達五、六萬人。十六日下午一時大會結束，電力公司的職工們層層護圍著胡世和烈士的靈柩，抬上了一輛大卡車。胡大嫂懷抱著不滿週歲的嬰兒，坐在駕駛台右邊。市長賀耀祖一面和胡大嫂握手，一面招呼著：「胡大嫂保重身體，撫養好孩子」。車的右側廂板上貼著用白紙寫的一排七個大字：「胡世和駕返岳池」。靈車繞城一週，向川北岳池縣緩緩駛去。

十、尾聲

為顧念胡世和因公殉職，重慶電力公司董事會決定，發給家屬撫恤金兩千元。又據知情人談，不是給錢，而是發的二十兩黃金。當時黃金市價每兩一百多元，二十兩黃金足已超過這個數字。也有人當面評價：「寧肯要人，也不要那二十兩黃金！」我說，一個烈士的英雄事跡是無價的，它可以「流芳百世、傳頌千年」。司馬遷嘗說：「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胡世和之死重於泰山，胡世和烈士永垂不朽！

趙芳舉寫於1997年春節

後記：

重慶解放1950年初，電力公司軍代室曾一度查詢1945年初重慶電力工人反特鬥爭中犧牲的工人胡世和的情況。據工會有人透露，胡世和可能同「中美合作所」的殉難志士一樣評為烈士。但一段時間之後就再也不提這件事了。延至夏季，黎昌堃告訴我，軍代室已經調查清楚：「『胡世和事件』是托派分子一手搞的」。這就是說，電力公司軍代室也不能不承認這場反特鬥爭是托派一手發動、領導直至最終勝利這一事實。我說，不管是誰搞的，胡世和的烈士身份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這場鬥爭的最終勝利所帶來的社會轟動效應，對蔣家王朝的崩潰所起的催化作用，應給予高度的評價！它為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樹立了一座歷史的豐碑。

完稿於1997年勞動節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in China today

Zhang Kai

The questions of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in China today have aggravated to a point of crisis though official economic figures seemed to fare well. In 2000, the state revenue had rapidly increased, with the rate of increase being three times tha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emier Zhu Rongji reported that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2,253 yuan, a real increase of 2.1%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He also reported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increas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as 4.7%. However, there appear to be many discrepancies with reports by experts and researchers,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there has been a drop in the cultivated area, output and pric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announced by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grain output for 2000 decreased by 9% as compared to 1999. The direct factor for this was a 5.3% decrease in the cultivated area. 2000 was the first year since 1949 when the cultivated area was smallest, dropping to below the warning level of 110 million hectares. The Statistics Bureau estimated that there would be a further decrease in 2001 of 1.7% of the cultivated land, which means cultivated land will drop to 107 million hectar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evere reduction of farmland is because peasants find farming unprofitable under the many heavy tariffs. Farmland has been abandoned. The Wen Wei Po in Hong Kong reported on February 19 that even in some key farming area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which has traditionally been endowed with fertile land and good harvests, large areas of good land have been abandoned in recent years. In Nan County, up to September 2000, only 50% of land has been re-contracted by peasants. In some villages, over 70% of farmland has been abandoned. Peasants pointed out directly that they did so in order to avoid having to shoulder heav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tariffs.

These problems have drawn the concern of many experts in the PRC. Below are excerpts taken from an essay written by the scholar Lu Xueyi, entitled "Finding a way out of the urban-rural segregation, and two policies for one country".¹ He sai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rural residents had been on the decrease for several years despite good harvests since 1996. After the winter of 1996, peasants had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selling grain and cotton, and after the summer of 1999, in selling almost all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per capita income from growing grain had dropped by over 300 yuan in 1999 as compared to 1996. In 1996, per capita income of peasants from growing cotton was 68.07 yuan, but it dropped to 36.68 yuan in 1999. Yet, income from grain and cotton made up the major inco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in three years from 1997 to 1999, the prices of grain and cotton had dropped by 30-4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rural industries were also experiencing difficulties, and about 40% were in a state of production stagnation or semi-stagnation. At the same time, peasants working in urban areas were being laid off as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on the employment of rural workers to ease the unemployment of the urban folk. In 1995, it was estimated that rural workers amounted to 80 million, and in 1999, it was estimated at 60 million. If on average a rural worker's net annual income in the cities was 2,000 yuan, it meant a decrease of 60 billion yuan of cash income for the countryside in a year.

Another scholar Wen Tiejun, when answering questions from the journalists in an article "Re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by integrated reform",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of rural organizations had been prevalent. He said that in the early 1980s, a

township would pay the wages of 8 cadres. By mid 80s, the establishment increased to about 30 people. Now, the usual number was 300. In some advanced regions, the towns would have an establishment of 800-1000.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rural economy ran badly, more rural industries had gone bankrupt, and the townships and villages were burdened with heavy deb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 1997 on ten provinces, the average debt of a township was 4 million yuan, and a village 200,000 yuan. Now, some townships had a heavy debt of 40 million yuan. This meant much of the brunt would be borne by peasants, and usury would be flagrant.

This is the reason for the continued exploitation of peasants despite repeated orders and decre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alleviating the burdens on peasants.

The poverty in the countryside may be seen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Outbreaks of protests have taken place by parents and pupils against the heavy fees. For example, on February 11, 2001, in Xiantao Town, Chaoya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about 800 primary school pupils took to the street, attacked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and burnt the furniture and files in a protest against the levying of supplementary fees in education.

A tragedy which broke out in Fanglin Village, Wanzai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reveals the plight in the rural scene. An explosion took place in a primary school in the village on March 6, 2001, reportedly killing 41 teachers and pupils, and injuring 27. Wen Wei Po reported that the school had the pupils work on fireworks in order to earn money for the school. 50 kilograms of saltpeter was reported to be stored in the school, material for making the fireworks. According to Sing Tao Daily News, a person from the management of a fireworks factory said that it was a prevalent practice for rural schools or households to be producing fireworks or firecrackers in violation of safety regulations. With annual income from farming amounting to only about 1,000 yuan, the income from working on fireworks would be 5-6 yuan a day. On the day of explosion in the Fanglin school, two classes of primary three pupils were working on the fuse of the fireworks. It was mandatory for pupils to do such work, or else they would have to pay a penalty of 2 yuan a day. The government later denied that the primary school was engaged in the processing work of fireworks, and attributed the incident to the sabotage of a lunatic Li Chuicai. However, some German journalists interviewed Li's former classmates who said that Li was a worker responsible for transporting the saltpeter and fireworks between the factory and the school. He also died in the explosion.

There has been more voicing of dissent and criticism of the policies on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and some come from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However, some of those that have made their criticisms have encountered revenge and blows. One example is Li Changping, a township party secretary who petition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se issues, but due to his outspokenness, he was forced to resign in September 2000, after which he found a job in Shenzhen. Yet, his popularity can be seen in his being elected by about 30,000 votes on the internet and letters by the Nanfang Zhoumo Newspaper as the Man of the Year, as hope and conscience of China. His case indicates the public opinion against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privileges, and in sympathy for the plight of the peasants.

March 20, 2001

¹ See *Dushu*, No.5 of 2000.0

² *Apple Daily* April 14, 2001.

³ See *Apple Daily* March 10, 2001.

香港	2	官商勾結圖利 民間怨憤日深.....	振言
	4	陳方安生辭職的啟示.....	微波
中國	5	「三農」問題在今天的中國.....	張開
	9	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	(摘錄) 李昌平
	10	官話大觀.....	(來論) 劉洪波
	11	我的兩次民主體驗.....	(來論) 劉洪波
國際	12	印尼：民主被出賣了！.....	畢圖
	16	左派的出版事業：一支新火焰.....	畢圖、納爾
	16	日本2001年度軍事預算案與中期防務整備計劃.....	高島義一
	17	沖繩右派排斥反戰人士、掩蓋侵略罪行.....	平井純一
	19	日本革命運動內部的「肅奸」與人權.....	樋口篤三
	20	女性領導運動前進.....	卡爾娃
	21	美國2000年大選的深層政治.....	喬姆斯基
	24	米洛舍維奇下台後的塞爾維亞.....	馬龍、多納特
	26	燃料短缺的抗議震撼歐洲.....	斯巴達聯盟
	28	俄國的宗教與無神論運動.....	肖軍輯譯
特譯	30	以托洛茨基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曼德爾
書評	36	左翼群像(2).....	樋口篤三
歷史	37	重慶地區托派發動的一次轟動大西南的反特鬥爭... (來論) 趙芳舉	
英譯	43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in China today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28 ISSUE 1 2001.3.31

HONG KONG

- 2 Public discontent on government business collusion.....Zhen Yan
4 The resignation of Anson Chan.....Wei Bo

CHINA

- 5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in China today.....Zhang Kai
9 From the heart of a county party secretary.....(reprint)Li Changping
10 Official speak.....Liu Hongbo
11 My 2 experiences on democracy.....Liu Hongbo

INTERNATIONAL

- 12 Indonesia: democracy betrayed.....K.Biddle
16 The left press in Indonesia.....K.Biddle, R.Noar
16 Japan: the 2001 military budget.....(tr)Zhao Jing
17 Okinawa right cover up invasion crime.....(tr)Fung Kerui

- 19 Internal purge in Japa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Tsunoguchi
20 Women lead the way.....S.Caldwell
21 US Election: two horses, one owner.....N.Chomsky
24 Serbia: is there new life after Milosevic?.....S.Malone, A.Thornett
26 Fuel protests rock Europe.....Spartacist League
28 Russia: religion and atheist movement.....(tr)XiaoJun
30 Trotsky as alternative.....E.Mandel

BOOK REVIEW

- 36 Portrait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Left (2).....Tsunoguchi

HISTORICAL STUDY

- 37 Trotskyists led anti-agent struggles in Chongqing.....Zhao Fangju

ARTICLE IN ENGLISH

- 43 Peasants,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in China today.....Zhang Kai